

「一國兩制」概況：民意調查及指數編制 第三次報告

項目負責人：宋恩榮教授 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研究）

第一部分：摘要

這是我們有關「一國兩制」指數的第三份報告，為香港實踐「一國兩制」作客觀評價。香港回歸 20 週年之際，民主思路於 2017 年中首次發佈「一國兩制」指數，並將會每六個月更新指數。「一國兩制」指數為以下 A、B 兩項指數的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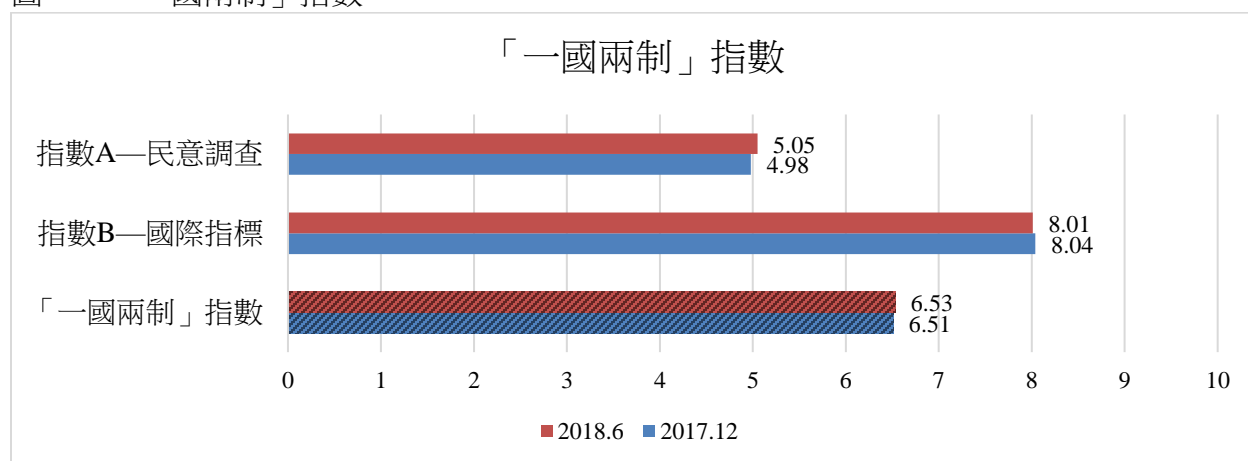
- 1) 指數 A—評分取自電話民調，為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各個方面的評價指數；
- 2) 指數 B—「自由民主指數」，取自國際智庫對自由民主水平所編製的指數。

我們每半年進行民意調查及收集國際指數的最新數據，更新指數 A 及指數 B，從而更新「一國兩制」指數。2018 年初，我們發佈了第二份報告。除了更新指數外，還推出了嶄新的「一國兩制」輿情指數，使用大數據技術衡量 1998 年至 2017 年底香港報紙對「一國兩制」的情緒，進而探索對民意的影響。

在本報告中，我們委託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進行第三輪電話調查編製指數 A，反映 2018 年中的狀況。我們亦根據國際數據更新指數 B。在「一國兩制」輿情指數方面，我們收錄了截至 2018 年六月底的報章報導，檢視報章對「一國兩制」的情緒。

在本報告中，當不同組別之間或不同調查之間評分的差異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將會特別註明。如未有註明，則代表評分差異在統計上不顯著。

圖一：「一國兩制」指數



圖一顯示第二輪和第三輪的指數 A、指數 B 及「一國兩制」指數。從 2017 年末至 2018 年中，指數 A 由 4.98 上升至 5.05，指數 B 則由 8.04 下降至 8.01。「一國兩制」指數因此由 6.51 升至 6.53，增加了 0.3%。

由此可見，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有所改善。從「一國兩制」輿情指數可見，香港報章對於「一國兩制」的情緒也有改善。可是，國際社會的見解有別於本地觀感，這相信與國際媒體對「佔中」和旺角騷亂案件的負面報導有關。

A. 三份報告的評分變化

三份報告的評分很有可能受到過去一年發生的政治爭議影響而變化。第一份與第二份報告之間發生以下爭議：

- 高等法院裁定四名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
- 「13+3」示威者被判入獄：13 名反新界東北發展及涉暴力的示威者與強行進入公民廣場示威的「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被判入獄；他們 16 人本來被判處社會服務，免受監禁，然而政府成功覆核刑期。2017 年 8 月，上訴法庭判處他們 6 至 13 個月監禁，更提出更嚴厲的量刑準則予未來涉及暴力的大型非法集會案件；
- 中共十九大工作報告強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 立法會透過修訂議事規則限制拉布；
- 中國訂立國歌法；
- 立法會通過關於高鐵「一地兩檢」安排的無約束力議案。

從 2017 年末至 2018 年中，即第二份與第三份報告之間，以下爭議也值得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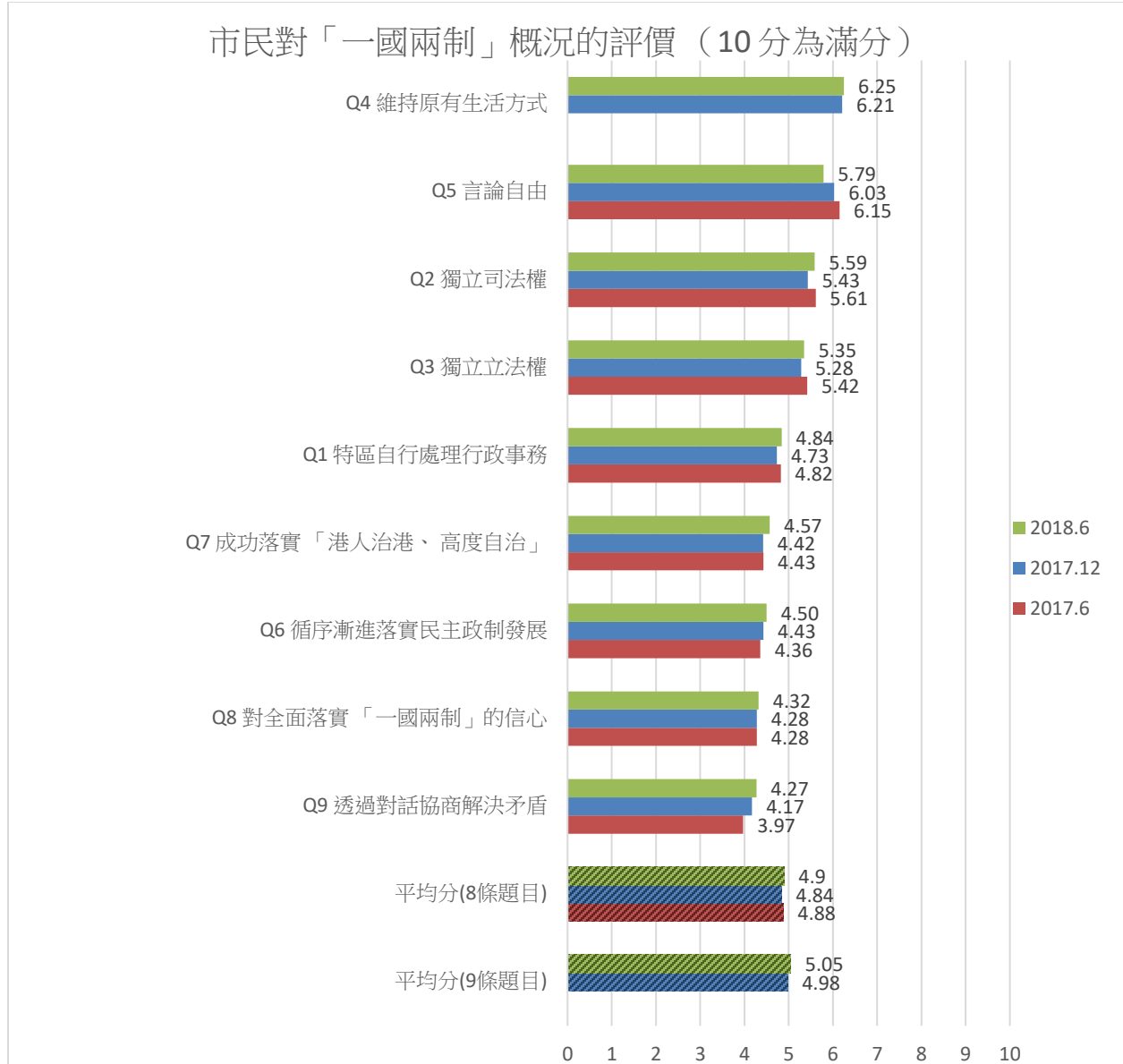
- 「雙學三子」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以技術因素推翻監禁判決，但認可上訴法院對未來涉及暴力的大規模非法集會案件所提出的更嚴厲判刑指引；
- 立法會經過漫長辯論後，於 6 月 14 日通過「一地兩檢」議案；
- 《國歌法》的本地立法程序將於 2018 年下半年展開；
- 本土民主前線領袖梁天琦參與旺角騷亂，於 6 月 11 日被判處 6 年監禁。

上述事件可能令市民和國際智庫對「一國兩制」的評價有負面影響，惟第三輪調查於 5 月 23 日至 6 月 2 日進行，未能涵蓋 6 月 11 日裁決的梁天琦案，因此事件帶來的影響未能納入調查結果。不過，「一國兩制」輿情指數涵蓋截至六月底的新聞情緒，能夠反映判決帶來的影響。

(1) 指數 A—民意調查

指數 A 為是次調查就「一國兩制」各方面九條問題的平均分（圖二）。我們考慮三種方式計算指數 A，分別為簡單平均數、「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簡單平均數給各個項目相同權重，容易理解，是最常見的方式。後兩種方式基於統計理論按各個項目的差異給予不同權重。詳細統計方法可參閱附錄 I。因為三種方式編制的指數 A 的結果十分接近，所以我們選取最簡單常用的方法，即九個項目的簡單平均數來編制指數 A。

圖二：市民對「一國兩制」概況的評價（比較三輪調查）



九條題目中的第四題「維持原有生活方式」於第一輪後經過修訂，因此第一輪調查的第四題評分不能跟第二輪和第三輪直接比較。為與第一輪結果比較，圖二展示其他八條在三輪調查均相同的問題的平均分。

比較第二輪與第三輪，所有題目的評分皆上升，只有「言論自由」例外。指數 A 由 4.98 升至 5.05，首次超越中位數 5 分。整體評分提升相信是由於林鄭月娥被委任為行政長官後，社會撕裂緩和（詳見下文）。「言論自由」評分下降，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這很可能是因為第三輪調查於五月下旬展開前，有兩位香港記者在內地遇襲。雖然遇襲記者來自香港，但嚴格來說，這些事件反映內地而非香港的言論或新聞自由。

有關「一國兩制」所有項目評分相當平穩，證明問卷設計穩當。四項評分一貫高於 5 分，由高至低順序排列如下：「維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及「立法獨立」。從結果可見，大眾對以上四個項目的態度相對正面。

另一方面，五項得分在三輪調查中都低於 5 分，由高至低順序排列如下：「特區自行處理行政事務」、「成功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循序漸進落實民主政制發展」、「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及「透過對話協商解決內地與香港矛盾的信心」。以上結果顯示市民對以上五項的態度相對負面。雖然九個項目的平均分上升至 5.05，但只僅僅高於中位數，評分不算高，值得決策者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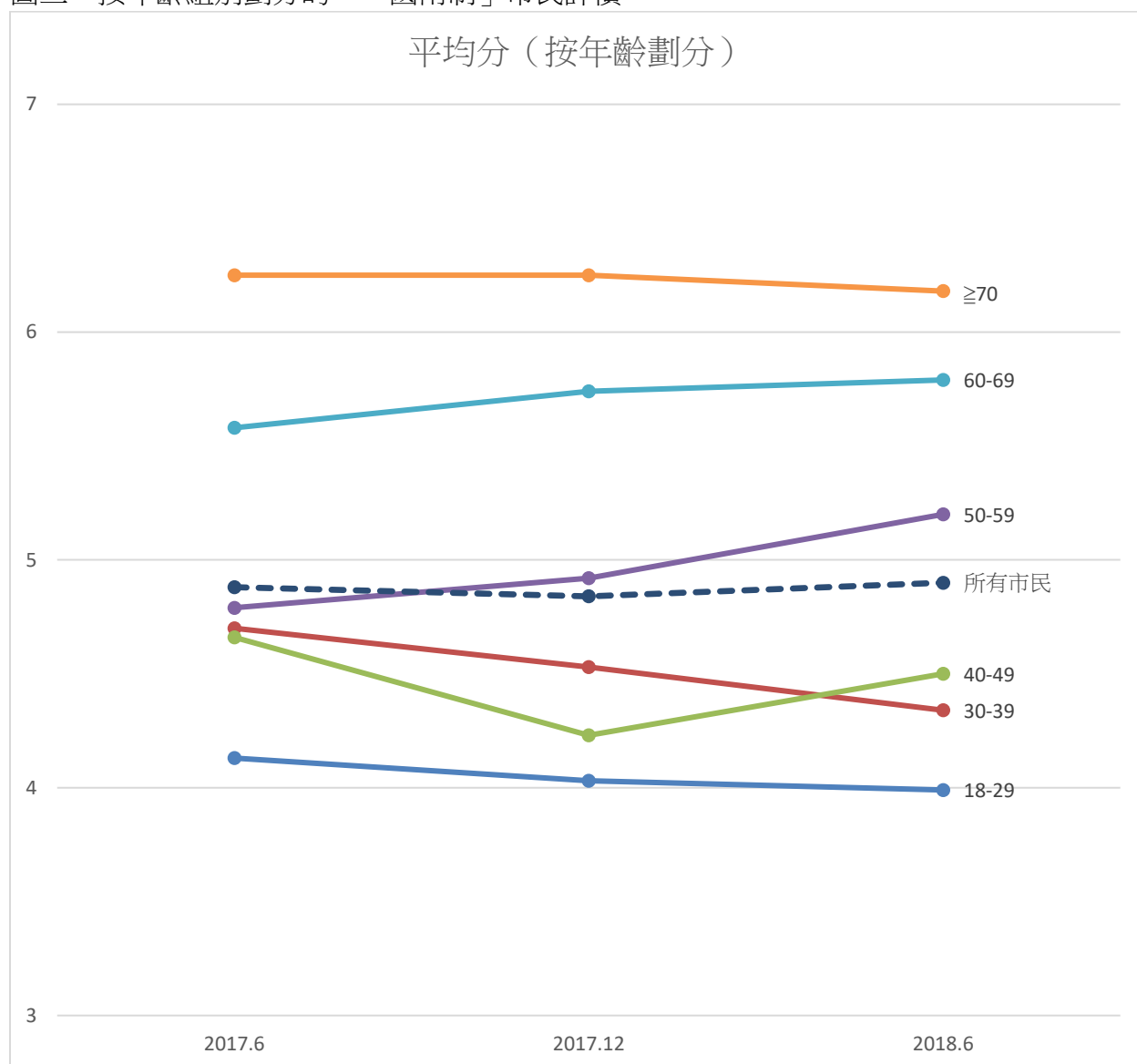
評分高低差別不大，在 4 分和 6 分多之間。相信市民心中對「一國兩制」有一個概括評分，無論詢問甚麼項目，市民的答案也會受到心中的概括評分影響，因此對各細項的評分也不會過於偏離整體上的概括評分。

(2) 不同世代及政治傾向的市民對「一國兩制」評價趨向兩極化

圖三和圖四分別顯示三輪調查中，各個年齡組別及政治傾向的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從圖中可見，對「一國兩制」評價的代溝與政治鴻溝頗大，並不斷加深。

對「一國兩制」評價的代溝從圖三顯而易見：年輕一代的平均分低於較年長的組別，18 至 49 歲組別與 50 歲或以上組別的差異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青年（18 至 29 歲）的八個項目平均分只有 4 分左右，而長者（70 歲或以上）的平均分則高於 6 分。此外，從第一輪至第三輪調查，最年輕的三個組別（18 至 29 歲、30 至 39 歲及 40 至 49 歲）評分全部下降，而較年長的兩個組別（50 至 59 歲及 60 至 69 歲）評分皆上升，顯示代溝加劇。

圖三：按年齡組別劃分的「一國兩制」市民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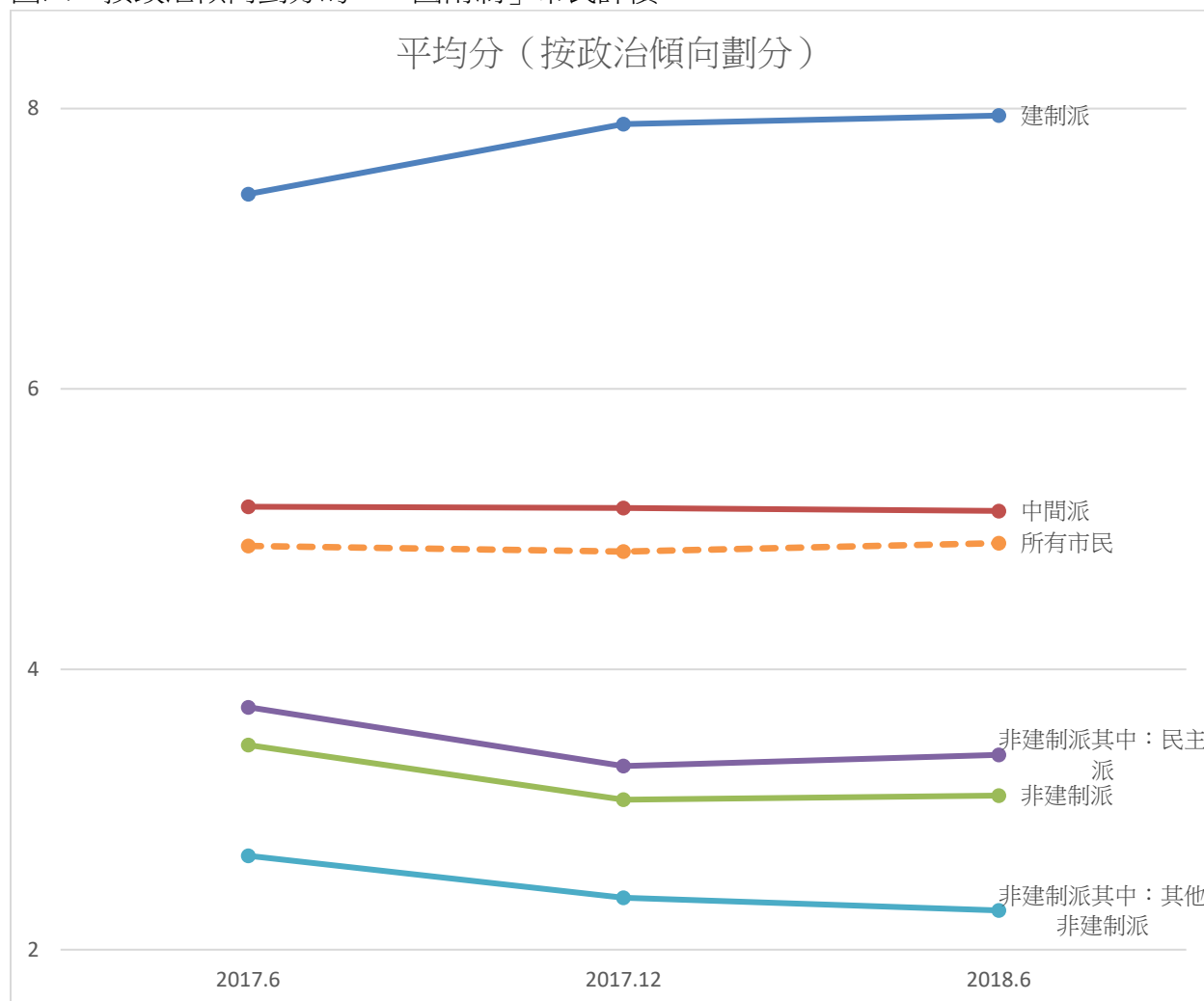


圖四為三輪調查中不同政治傾向的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統計分析顯示，與中間派相比，建制派評分顯著較高，而非建制派評分則顯著較低。非建制派分為「民主派」及「其他非建制派」（主要是本土派及自決派）。非建制派當中，「其他非建制派」的評價（大約 2 分至 3 分）比「民主派」（大約 3 分至 4 分）低。三輪調查中，中間派（包括「中間派」及沒有政治傾向的市民）的評分頗平穩，徘徊在略高於 5.1 分的範圍。

建制派與非建制派之間有相當大的政治鴻溝，且正在加深。統計分析顯示，建制派的高評分顯著增長（由第一輪至第三輪調查上升 7.6%），而非建制派的低評分則顯著下降（由第一輪至第三輪調查下降 10.4%）。兩極化趨勢明顯。

從第一輪至第三輪調查，雖然市民對八個項目的整體平均分平穩，並由 4.88 稍微上升至 4.90，但是代溝及政治鴻溝不斷加深，問題嚴重。

圖四：按政治傾向劃分的「一國兩制」市民評價



(3) 指數 B — 「自由民主指數」

指數 B 為三項指數的平均分，分別為卡托研究所及菲沙研究所編制的「經濟自由指數」及「個人自由指數」和經濟學人智庫編制的「民主指數」。香港在經濟自由方面一直名列世界第一，在個人自由方面也名列前茅。

最新發表的「經濟自由指數」和「個人自由指數」只反映 2015 年的數據。我們參照卡托研究所及菲沙研究所的計算方法，在第二份報告將兩項指數更新至 2016 年，在本報告則進一步更新至 2017 年。香港的「個人自由指數」從 2008 年攀升至 2014 年的高峰，隨後回落。「民主指數」從 2008 年攀升至 2015 年的高峰，隨後同樣回落。鑑於國際社會對香港近期的政治事件反應負面，這些指數下降並不令人感意外。

- 「個人自由指數」從 2008 年的 8.87 攀升至 2014 年 9.08 的高峰，再回落到 2017 年的 8.58，自 2014 年的高峰下降了 5.5%。七個子項目中，有四個下降，包括法治（下降 16.0%）、宗教自由（下降 7.4%）、結社自由（下降 22%）和性別認同及關係（下降 7.5%）。兩個子項目上升，分別是安全（上升 4.8%）和言論及資訊自由（上升 6.9%）。
- 儘管 2014 年至 2017 年錄得跌幅，香港在個人自由方面的得分仍然良好，接近日本、台灣、南韓及新加坡等發達鄰近地區，證明香港能夠在「一國兩制」下捍衛高水平的人權與個人自由。
- 「民主指數」由 2008 年的 5.85 上升至 2015 年 6.5 分的頂點，排名由第 84 位提升至第 67 位，相信與立法會增加直選議席有關。但此評分在 2016 年回落至 6.42，在 2017 年再降至 6.31。香港的得分低於日本，台灣和韓國，與新加坡相約。由於香港未能普選行政長官，所以香港在「民主指數」中的排名不算突出。
- 「經濟自由指數」由 2016 年的 9.09 上升了至 2017 的 9.13。指數 B 是「經濟自由指數」、「個人自由指數」和「民主指數」的平均分，由 2016 年的 8.04 下降至 2017 年的 8.01。

B. 電話調查的熱門議題

(1) 三輪調查的共同熱門議題

- 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當內地與香港出現矛盾時，最多市民認為兩者的責任「一半半」，反映中央政府與香港雙方均需反思自身責任。
- 因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而計劃移民的比例由第一輪調查的 9.4% 下降至第二輪的 7.7%，卻在第三輪回升至 9.4%。
- 三輪調查的結果均顯示，市民對今屆政府是否需要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進行諮詢的取態兩極化，未有共識，執政者要小心行事。

(2) 第二輪及第三輪調查的共同熱門議題

- 市民對林鄭月娥被委任為行政長官的觀感普遍正面：第二輪調查中，49.0%市民認為社會撕裂沒有改變，41.0%認為「減少」，只有7.6%認為「增加」。第三輪調查的相應數字分別為46.5%、42.1%及9.1%。兩輪調查中，認為「減少」者都大幅多於「增加」者。
- 第二輪調查中，市民對香港訂立《國歌法》有一定擔憂：42.7%市民認為訂立《國歌法》對「一國兩制」有「負面影響」，34.3%認為「有影響」，只有16.3%認為有「正面影響」。第三輪調查中，雖然認為訂立《國歌法》對「一國兩制」有「負面影響」的市民稍為下降，大眾觀感仍然負面，相應數字是：39.1%、38.1%及15.7%。

(3) 第三輪調查的新議題（0至10分）

- 市民對粵港澳大灣區認識不深（平均分為3.85分）。只有12.2%市民「會」考慮前往大灣區發展，11.9%「或者會」，但63.1%「不會」。
- 市民同意香港應該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平均分為6.3分）及參與「一帶一路」的發展（平均分為6.37分）。
- 對於中聯辦於四月舉行的開放日能否拉近與公眾的距離，市民反應稍微正面（平均分為5.32分）。

雖然香港市民對言論自由及《國歌法》立法有擔憂，但是他們對近期爭議依然務實。在第二輪調查的熱門議題中，市民比較重視高鐵「一地兩檢」安排的運作效率，而非政策會否抵觸《基本法》。他們亦重視立法會的有效運作，多於無休止的拉布（詳見第二份報告，第35至42頁）。

第三輪調查中，香港人對制訂《國歌法》的負面看法也有所緩和。他們同意香港應該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面對擱下政改爭議，轉而聚焦改善民生的林鄭月娥，市民繼續抱有正面態度。即使三輪調查之間出現不少政治爭議，市民的務實態度與他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有所改善相當一致。

C. 市民對「香港人」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1) 對「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雙重身份認同

- 以10分為滿分，市民對「香港人」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在過去一年持續上升。從2017年中至2018年中，「香港人」身份認同由7.75分上升至8.02分，「中國人」身份認同由6.63分上升至6.78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增幅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

- 愈來愈大部分市民對「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均有較高認同（第一輪、第二輪及第三輪分別為 55.9%、56.1% 及 57.5%），對兩種身份的認同皆高於中位數 5 分。
- 三輪調查中，市民對「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認同均呈現統計上顯著的正相關，即愈認同「香港人」身份的市民亦愈認同「中國人」的身份，反之亦然。市民對「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認同相輔相成，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
- 由於多數香港人擁有「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雙重身份認同，傳統民調限制受訪者在兩個身分（「香港人」和「中國人」），或者四個身分（「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人」）之間作出選擇容易出現偏頗。這是因為它們隱然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對立，未能反映兩種身份認同在過去一年皆有所加強。

(2) 不同組別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 三輪調查中，除了青年（18 歲至 29 歲）外，所有年齡組別及所有教育程度（由小學程度至研究院）的受訪者對「中國人」身份均有較強認同，評分均高於中位數。
- 建制派與中間派強烈認同「中國人」身份。建制派認同感的增幅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
- 非建制派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不強，認同感不斷下降，跌幅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民主派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評分雖然稍高於中位數，但其認同感整體上有所減弱。「其他非建制派」（主要是本土派及自決派）對「中國人」身份認同較弱，其認同感在三輪調查中持續下降，跌幅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非建制派（佔第三輪調查受訪者的 25.2%）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與大眾愈來愈偏離，情況令人擔憂。
- 青年（18 至 29 歲）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繼續徘徊於中位數（5 分）。決策者須努力培育青年的國民身份認同。

D. 「一國兩制」輿情指數

- 「一國兩制」輿情指數從 20 家本地報章搜集 127,000 多篇報導，逾 6,300 萬字，藉此透視大眾傳媒對「一國兩制」的感受及意見。媒體所傳遞的情緒是形成民意的重要因素，故此，「一國兩制」輿情指數有補充我們的「一國兩制」指數不足之處的功能。
- 長遠而言，如資源許可，輿情指數能為民意形成開拓更多研究機會。輿情指數能以高頻率編製（如每月），因為它不受以調查方式收集民意時所產生的滯後影響。它亦可以調查特定重大事件（例如高鐵「一地兩檢」安排）對媒體情緒的影響，或比較本地及海外媒體的情緒。

- 輿情指數的基數月份定於 2017 年 7 月，即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數值由 1998 年 4 月開始至 2018 年 6 月。我們將「一國兩制」輿情指數的整體趨勢與兩項常用的民調進行比較，即香港電台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就市民對「一國兩制」看法的調查。「一國兩制」輿情指數的趨勢與兩項民意調查相似：2000 年初上升至 2007 年左右的高峰，然後在 2014 至 2016 年，「佔領中環」及「旺角騷亂」期間跌至低谷，隨後復蘇。
- 「一國兩制」輿情指數的趨勢與近期的重大事件息息相關，尤其是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銅鑼灣書店」事件和「旺角騷亂」引起廣泛關注，使指數大幅下跌超過 20 點。然而，「一國兩制」輿情指數自 2016 年 7 月起反彈。梁振英在 2016 年 12 月宣布放棄連任後，指數有明顯升幅。2017 年，林鄭月娥當選為行政長官時，升勢更進一步提升。林鄭的首年施政期間，雖然面對「一地兩檢」條例及「旺角騷亂」案件等爭議，指數仍從 2016 年 7 月的 73 點上升至 2018 年 6 月的 99 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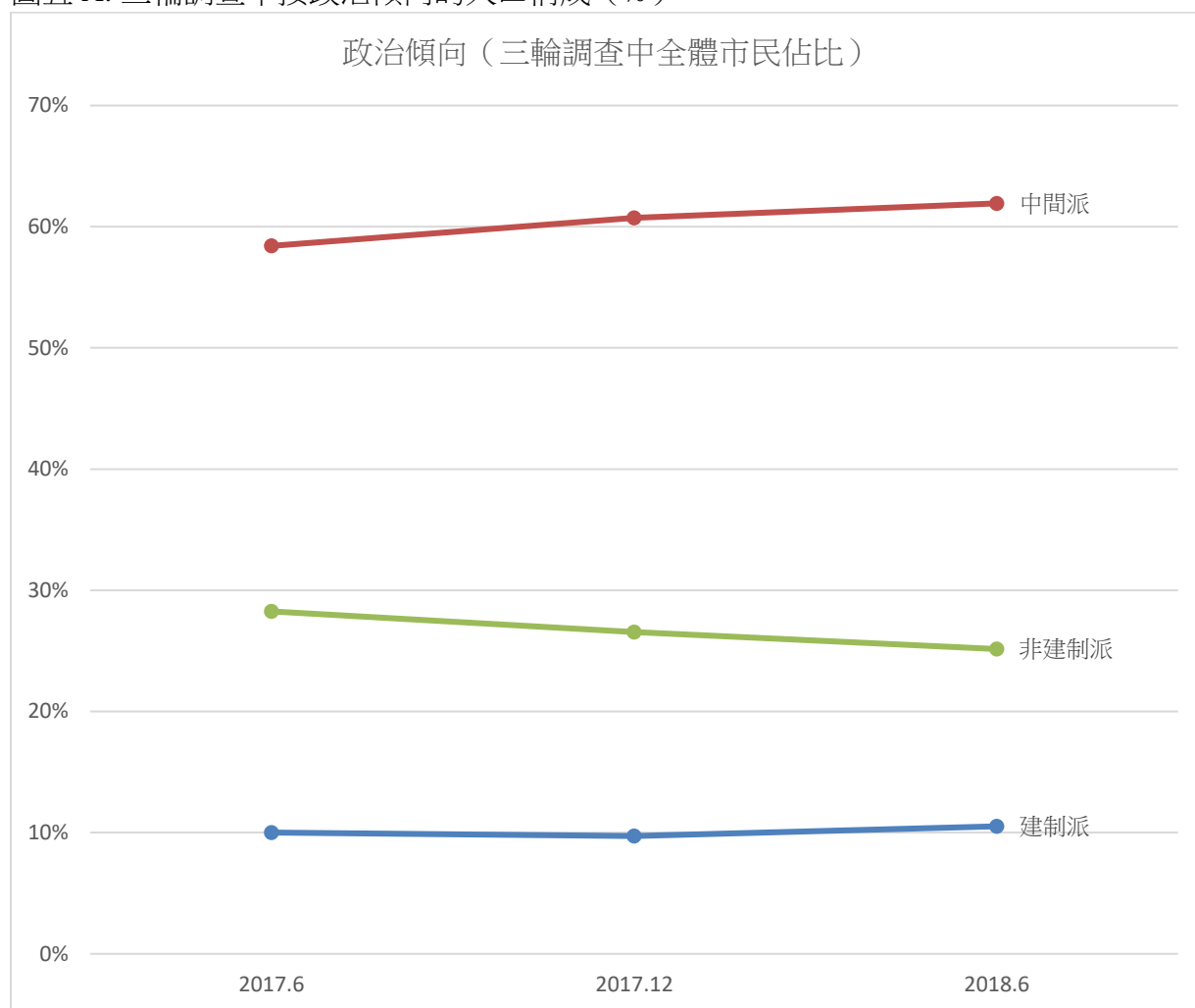
E. 林鄭月娥施政下的去激進化與溫和政治

三輪調查涵蓋林鄭月娥的首年施政，結果能用作評估她的表現和她執政下香港普遍的政治情緒。如前文所述，市民相信社會撕裂經已減輕。此外，香港人普遍支持由政府提出的主要發展計劃，包括高鐵一地兩檢安排、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倡議。有關「一國兩制」的公眾評價和新聞情緒皆有改善。

再者，中間派在調查中的比例有所增加，非建制派支持者的比例則較去年減少。圖五 A 顯示不同政治傾向佔人口的比例，圖五 B 則顯示不同類別的非建制派佔人口之比例。

圖五 A 顯示中間派屬最大組別，而它的比例由 2017 年中的 58.4% 持續上升至 2018 年中的 61.9%。同期，非建制派的比例由 28.3% 持續下降至 25.2%，而建制派的比例則由 10.0% 輕微上升至 10.5%。以上趨勢明確顯示去激進化與溫和政治在林鄭月娥首年施政下逐漸出現。不過因為我們只有三個日子的數據，不能斷定以上的趨勢在統計上是否達到顯著水平，以上的只能視為初步趨勢而非確定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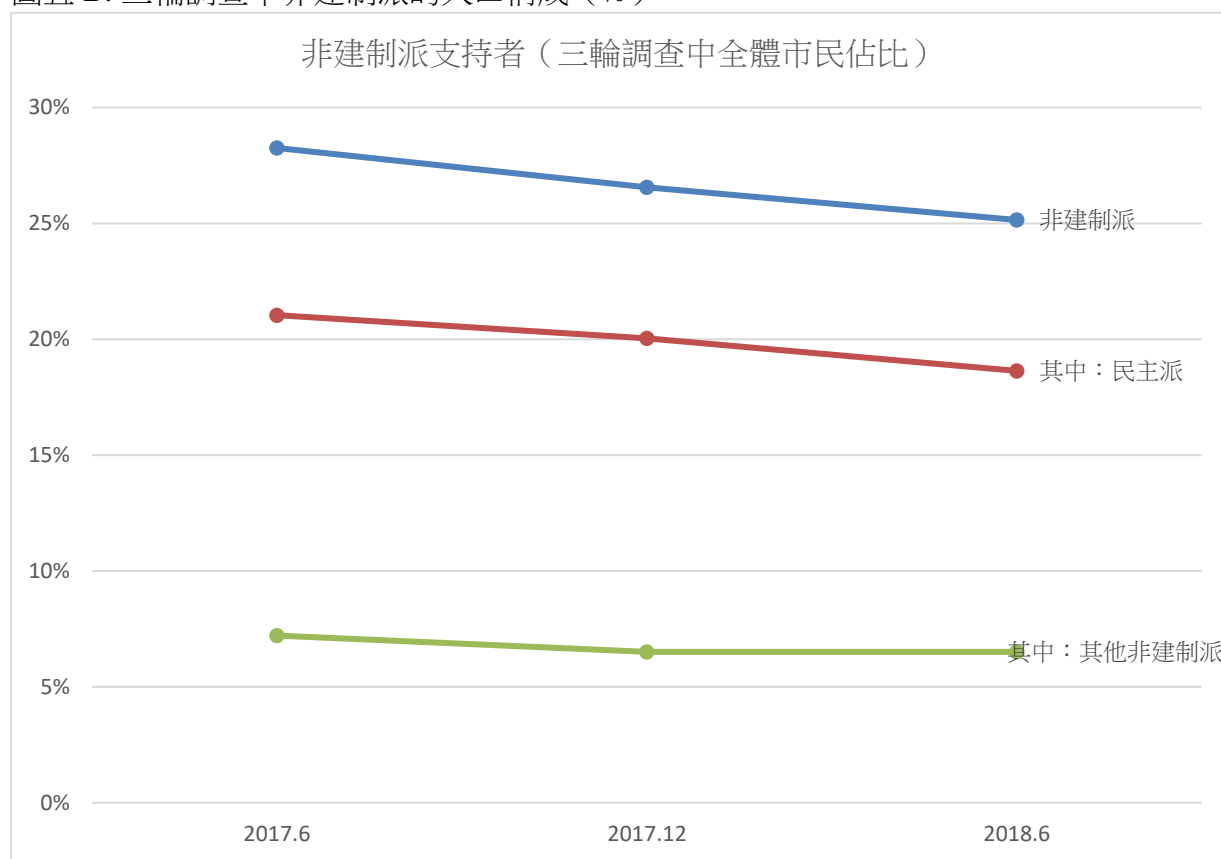
圖五 A: 三輪調查中按政治傾向的人口構成 (%)



圖五 B 顯示非建制派當中，「民主派」及「其他非建制派」的比例分別由 21.0%降至 18.6%，以及由 7.2%降至 6.5%。中間派的比例上升 3.5 個百分點（增加人數達 21 萬 2 千人），與此同時，非建制派的比例下降 3.1 個百分點（流失人數達 18 萬 8 千人），非建制派支持者有逐漸轉投中間派的跡象，與最近的補選結果相符，也可能是市民認為社會撕裂改善的原因。

在我們的調查樣本中，非建制派的比例一直少於 30%，似乎比 2016 立法會選舉中非建制派候選人所獲得的 54% 選票少得多。然而，不少香港成年人並非登記選民，或者已登記卻沒有投票。在 2016 立法會選舉中，香港有大約 480 萬合資格選民，其中登記選民只有 380 萬，之中只有 220 萬登記選民投票。非建制派候選人在該次選舉取得 119 萬票，數量少於全部合資格選民的 25%，更少於成年人口（外來家庭傭工除外）的 20%。不熱衷投票的市民有較大可能屬於中間派，而不是非建制派。因為非建制派較積極投票及發聲，香港的政治情緒容易受到他們影響。有鑑於此，不少政治情緒可能具誤導性。

圖五 B: 三輪調查中非建制派的人口構成 (%)



F. 林鄭月娥首年施政：民情與輿情

我們的三輪調查顯示，林鄭月娥首年施政首年，逐漸出現去激進化和溫和政治。不過三輪調查只涵蓋一年時間，不能追溯往年的發展。我們的「一國兩制」輿情指數涵蓋過去 20 年，能夠反映往年的發展：報章對「一國兩制」的情緒從 2016 年年中 73 點的低點上漲至 2018 年年中的 99 點。然而，輿情指數的覆蓋面有其不足，因為它只檢視報章對「一國兩制」的情緒，而不是大眾的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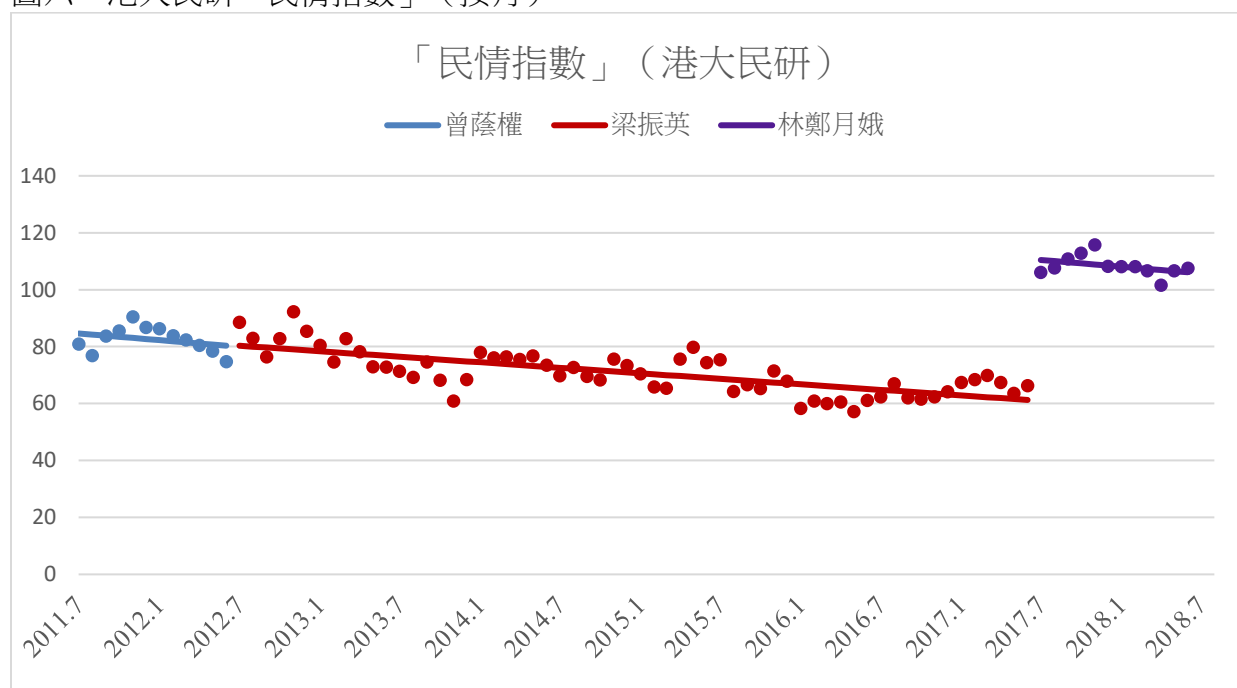
我們的主指數及輿情指數聚焦公眾對「一國兩制」的評價，而港大民研的「民情指數」則反映公眾對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的概括評價。「民情指數」覆蓋時期較長（1992 年至 2018 年中），能勾畫香港社會的概括狀況，協助我們解讀主指數及輿情指數的變化。

根據港大民研，「民情指數」旨在「量化香港市民對香港社會的情緒反應，以解釋及預視社會出現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民情指數』包涵了『政通』和『人和』兩個概念，分別以『政評數值 (GA)』和『社評數值 (SA)』顯示。『政評數值 (GA)』泛指市民對整體政府管治的表現評價，而『社評數值 (SA)』則泛指市民對整體社會狀況的評價，由多項民意數字組合而成。指數本身及兩項數值均以 0 至 200 顯示，100 代表正常」（<https://www.hkupop.hku.hk/english/release/release980.html>）。

圖六顯示過去七年間每月的「民情指數」。從 2011 年中到 2018 年中，涵蓋三位行政長官的任期，即曾蔭權的最後一年，梁振英的五年，及林鄭月娥的第一年。在林鄭月娥上台前，「民情指數」一直低於 100，林鄭月娥上任後始超越 100。

為剖析「民情指數」得分的根本趨勢，我們採用最小二乘法計算出最匹配三任特首得分的三組線性趨勢。曾蔭權最後一年任期的得分由 81 跌至 75，梁振英第一年的得分停留在相約水平。統計測試（鄒氏檢驗）顯示，由於曾蔭權與梁振英交接前後的「民情指數」得分相近，所以特首換人沒有帶來結構性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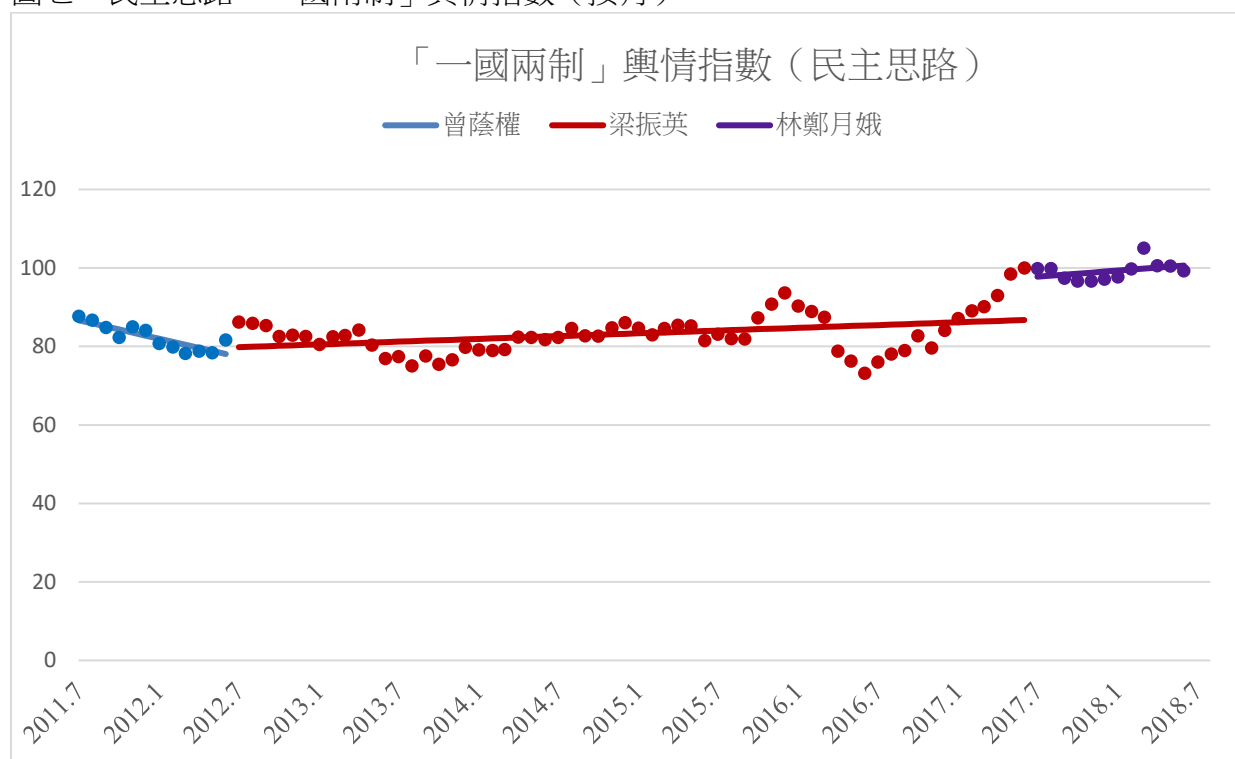
圖六：港大民研「民情指數」（按月）



梁振英任期內「民情指數」的趨勢下降，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得分從他施政第一個月的 89 降至 2017 年 6 月，即最後一個月的 66。林鄭月娥上任的第一個月，得分飆升至 106。梁振英至林鄭月娥的交接期出現結構性變化，達統計上非常顯著的水平。林鄭月娥首年施政期間，「民情指數」得分在 102 的低點及 116 的高點之間上落。2017 年 6 月的得分為 108，稍高於一年前的 106，得分沒有統計上的顯著變化。

圖七顯示輿情指數（6 個月平均數）的趨勢。與分析「民情指數」一樣，我們採用最小二乘法計算出最匹配三任特首得分的三組線性趨勢。統計測試顯示，從曾蔭權到梁振英的交接沒有結構性變化，而從梁振英到林鄭月娥的交接卻出現結構性變化，變化達統計上非常顯著的水平。

圖七：民主思路「一國兩制」輿情指數（按月）



曾蔭權任期內輿情指數的趨勢下降，而梁振英任期內的得分雖然處於低水平，但其趨勢似乎上升。不過此升幅主要源自 2016 年 12 月，梁振英宣布放棄競逐連任而來。公眾得悉特首將會換人後，輿情指數由 2016 年 11 月的 80 點躍升至 2017 年 6 月的 100 點。如果我們剔除 2016 年 11 月以後的得分，梁振英得分的趨勢變成水平而非上升。林鄭月娥得分的趨勢輕微上升，但漲幅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

我們的統計分析顯示，從梁振英到林鄭月娥的交接期間，「民情指數」與輿情指數得分急升，反映統計上非常顯著的結構性變化，再一次印證在林鄭月娥施政下，政治與社會環境顯著走向去激進化與溫和的方向。

G. 非建制派支持者的不滿情緒

我們的調查顯示非建制派似乎愈來愈不滿現狀。如前文所述，他們對「一國兩制」評價下降，跟普羅大眾的趨勢相反。他們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也下降，同樣跟大眾趨勢相反。他們比一般市民更希望移民海外：非建制派希望移民的比例由 2017 年中的 19.0% 大幅升至 2017 年底的 21.9%，再進一步上升至 2018 年中的 25.2%，詳見下文。

雖然非建制派屬少數，但為數也可觀。此外，他們在大部分選舉得到多於一半的選票，對民意有較大影響力。他們的不滿持續升溫，實屬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需要解決的嚴重社會及政治問題。

H. 「一國兩制」評價的分歧：香港市民與國際智庫

我們的民調與國際指數各有特點，雖然大異其趣，但兩者的結果也有相同之處。第一，香港市民與國際智庫均視香港為自由社會。香港的「人類自由指數」（「個人自由指數」與「經濟自由指數」的平均）評分居世界前列，香港市民對「言論自由」及「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評分也較高（高度自由向來被視為香港「原有生活方式」的特點）。第二，香港市民與國際指數對民主發展的評分均較低。

至於不同之處，是國際指數對香港的評分整體比民調較高，不過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有所改善，國際智庫的評分卻趨向負面。

國際指數評分較高，相信是由於其整體性及廣泛性：當中涵蓋大量發展中國家及地區，而香港已屬發達地區之列，社會經濟發展比其他國家及地區領先一定水平，所以得分會處於較高的區間。另外，因為市民心目中對「一國兩制」有較高要求，所以可能在民調上給予比較嚴格的評分。香港在回歸前已有成熟的法治基礎和人身自由，政制亦逐步民主化，所以市民對基本法承諾的高度自治和保障人權及自由有更高期望。

雖然國際指數對香港評分較高，但是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正上升，而國際智庫的評分卻下跌，背後有三個可能性。首先，香港市民對於行政長官的人選變動非常重視，帶來去激進化的趨勢，而國際智庫大都忽略了這個轉變。其次，西方國家愈來愈擔心中國崛起將會挑戰其優勢，所以對中國的態度由合作轉向對抗。西方智庫對「一國兩制」的評價不能完全擺脫此態度轉變的影響，而香港首當其衝成為戰靶。第三，傳統以來，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均忽視透過西方大眾傳媒捍衛「一國兩制」，往往未能適時駁斥或解釋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在西方媒體的批評。

儘管西方智庫對「一國兩制」的評價可能難以擺脫意識形態上的偏見，但僅僅視之為政治宣傳而漠視其評價則大錯特錯。它們的評價可能帶有偏見，但也可能反映實踐「一國兩制」中的真正弱點。此外，它們對國際投資者的影響不容低估。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中國最開放與國際化的城市，也是中國通往世界的橋樑。我們需要認真對待西方智庫的評估，以反思實踐「一國兩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這種分歧亦突顯了編製一個均衡的「一國兩制」指標需要同時納入香港市民和國際智庫的意見。

第二部分：主報告

- I. 「一國兩制」概況：電話民調
- II. 國際自由民主指數
- III. 「一國兩制」輿情指數
- IV. 附錄

I. 「一國兩制」概況：電話民調

為了解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我們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 2018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2 日進行電話調查，以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 1,004 名 18 歲以上操粵語或普通話的市民（在 95% 置信水平下，抽樣誤差為 $\pm 3.09\%$ ），回應率為 37.2%，符合統計學及科學化的調查標準。詳細的調查結果（附錄 II）已上載至民主思路網站 <http://pathofdemocracy.hk/>。

評分尺度：

調查的數據收集過程按 1 至 7 分為評分尺度，以 4 分為中位數，是心理學調查常用的尺度。在實際調查過程，我們不採用 0 至 10 分的尺度，因為分類太細緻，市民難以選擇。統計分析上，我們繼續採用 1 至 7 分的尺度。不過，由於現有指數多以 0 至 10 分呈現（5 分為中位數），是以我們在編制指數時，利用數學方法將調查結果由 1 至 7 分的尺度轉換成為 0 至 10 分的尺度。

調查結果摘要：

(1) 市民的「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認同（Q12、Q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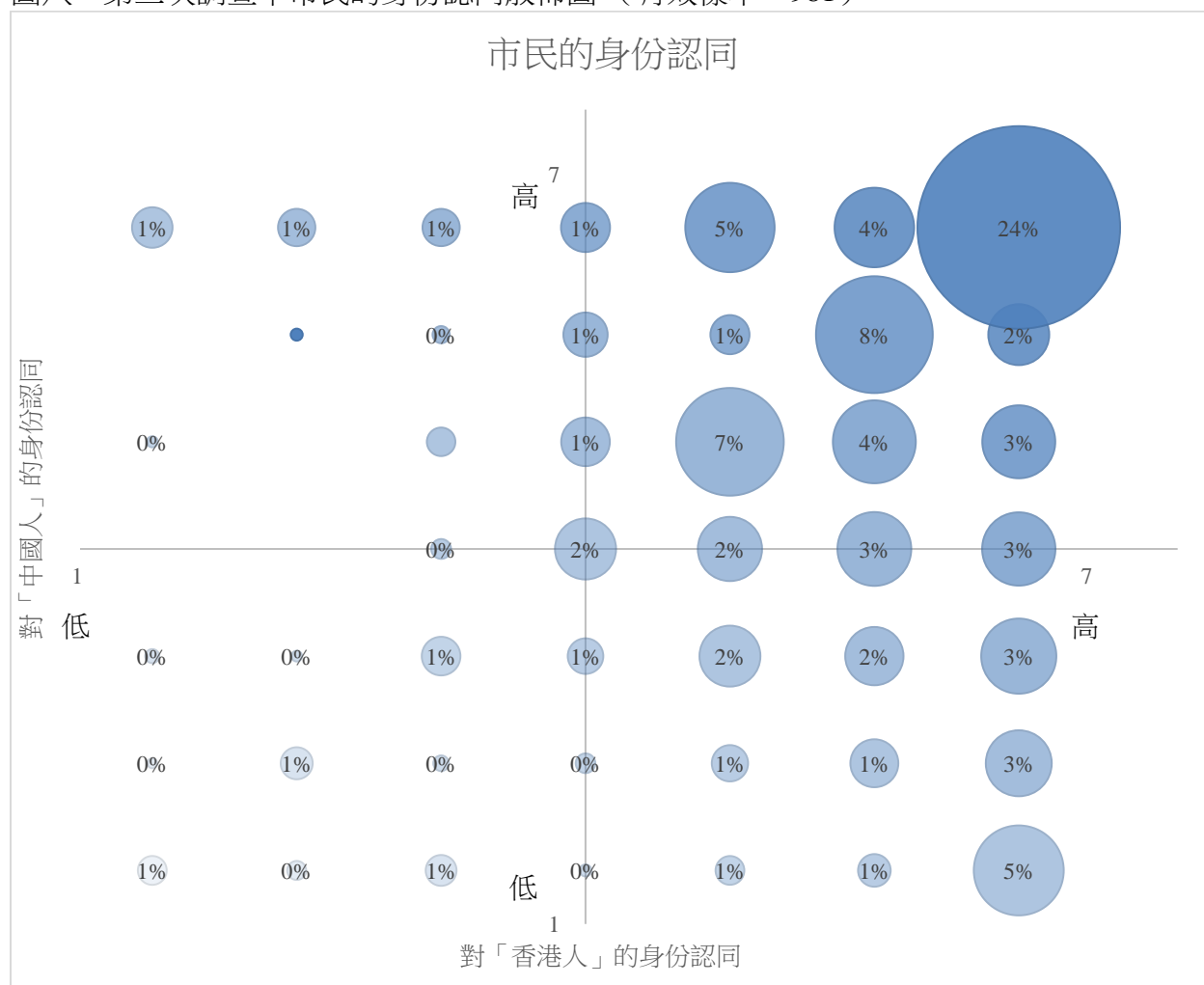
我們分別詢問市民對「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認同程度：見表一。市民對「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均有較高認同。從第一輪至第三輪調查，按 1 分至 7 分的尺度，市民的「香港人」身份認同由 5.65 分上升至 5.81 分（按 0 分至 10 分的尺度即由 7.75 分上升至 8.02 分）。同期，按 1 分至 7 分的尺度，市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由 4.96 分上升至 5.07 分（按 0 分至 10 分的尺度即由 6.63 分上升至 6.78 分）。

表一：市民的「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認同：比較三輪調查

	平均分 (1-7)			平均分 (0-10)		
	2017.6	2017.12	2018.6	2017.6	2017.12	2018.6
「我係香港人」	5.65	5.76	5.81	7.75	7.93	8.02
「我係中國人」	4.96	5.00	5.07	6.63	6.71	6.78

市民對「香港人」及「中國人」的認同程度可以利用散佈圖 (scatter plot) 顯示。圖八的橫軸為對「香港人」的認同程度，縱軸為對「中國人」的認同程度。按 1 至 7 分的尺度，4 分為中位數，表示中等認同。高於 4 分代表較高認同，低於 4 分代表較低認同。圖六為第三輪調查的散佈圖，對「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均擁有高度認同的組別人數最多，共 233 人兩者均選擇最高的 7 分 (佔總數 23.8%)。

圖八：第三次調查中市民的身份認同散佈圖 (有效樣本：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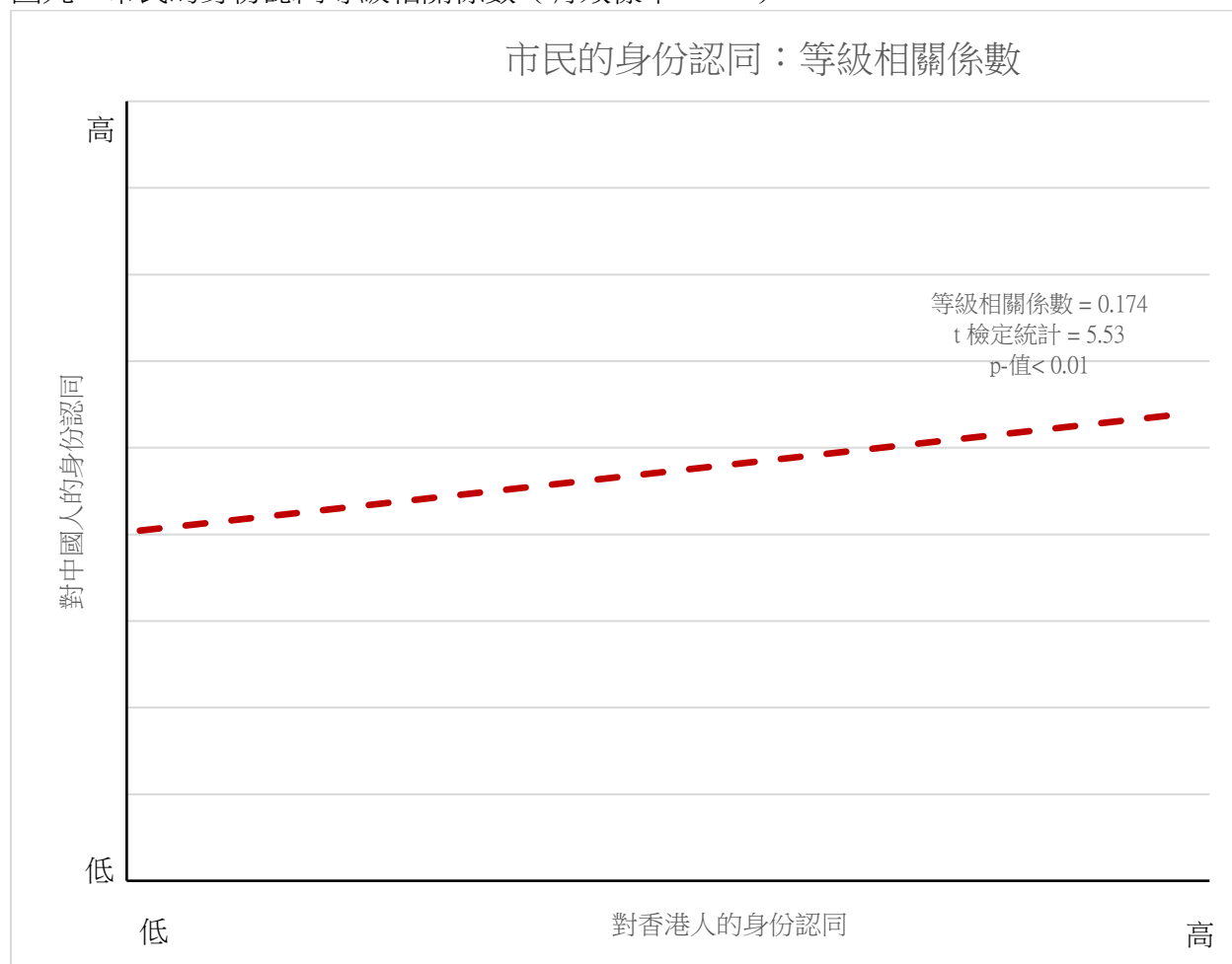


圖八清楚顯示大部份香港市民同時認同自己擁有「香港人」及「中國人」的雙重身分。第一輪及第二輪調查的結果（見早前報告）與第三輪調查非常相似。對「香港人」及「中國人」兩種身分均擁有較高認同（兩者皆高於 4 分）的市民由第一輪調查的 55.9% 上升至第二輪調查的 56.1%，再上升至第三輪調查的 57.5%。

認同「中國人」身份未必等於「愛國」，不過同時認同「中國人」及「香港人」兩種身份卻是「愛國愛港」的先決條件。香港大部份市民均同時認同「香港人」及「中國人」兩種身份，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

統計分析發現市民的「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認同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即愈認同「香港人」身份的市民亦愈認同「中國人」身份（見圖九），反之亦然。等級相關係數（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為 0.174，統計上非常顯著，達到 99% 的置信水平。與第一輪及第二輪調查相似，該係數分別為 0.132 及 0.184，同樣非常顯著。結果證實「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認同相輔相成，也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

圖九：市民的身份認同等級相關係數（有效樣本：981）



(2) 問卷設計：比較其他調查

在香港，調查市民的身份認同有兩種問卷設計：「主要身份」及「多元身份」設計。「主要身份」將身份認同歸類為「香港人」及「中國人」兩種，或者基於「香港人」及「中國人」再加入兩種混合身份（「香港的中國人」及「中國的香港人」）共四種。受訪者被要求從這兩種或四種身份中選擇一種。二擇其一的問卷設計隱然假設「香港人」及「中國人」身分對立：如果認同「香港人」的比例增加，認同「中國人」的比例必定減少（反之亦然）。雖然四擇其一的問卷接受混合身份（「香港的中國人」及「中國的香港人」），但各種身份仍然對立：如果認同其中一種身份的比例增加，認同其他身份的比例必定減少。採用「主要身份」的調查無法反映市民可能對「香港人」及「中國人」兩種身分認同同時加強（或同時減弱）。

我們的調查採用「多元身份」的問卷設計，而香港其他調查多數採用「主要身份」設計。其中例外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港大民研）的身份認同調查，同時採用「主要身份」及「多元身份」兩種問卷設計。雖然港大民研會公佈兩種結果，但是由於「主要身份」為多數調查所採用，所以香港傳媒側重報道「主要身份」的結果。

我們的調查及分析顯示「多元身份」是更合適的問卷設計，原因有二：第一，多元身份是香港的常態。愈來愈多的大多數市民對「香港人」及「中國人」兩種身份均有較高認同，要求市民從以上四種身份（或兩種身份）選擇一種容易出現偏頗。第二，我們的三輪調查中，市民對「香港人」及「中國人」兩種身份認同同時加強，此乃採用「主要身份」的調查未能反映的事實。

圖八顯示，有 43.0% 市民對兩種身份的認同程度相同：要求市民二擇其一容易令結果具誤導性。再者，散佈圖顯示人數最多的三個組別，給予兩種身份同樣為 5 分、6 分或 7 分的高評分。這三個組別共佔受訪者 38.5%。

除了容易出現偏頗外，採用「主要身份」的調查都不能回答由本研究提出，有關身份認同的兩個重要問題：

- i. 有多少市民同時對「香港人」及「中國人」兩種身份擁有高度認同（或較高認同）？
- ii. 市民對「香港人」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否相關？

雖然港大民研也採用「多元身份」作調查，但從未發佈對以上兩個問題的分析。就我們所知，本研究為目前唯一採用「多元身份」框架去分析以上兩個問題的調查。

我們的調查發現最近一年，市民對「香港人」及「中國人」兩種身份認同同時上升。另一方面，採用「主要身份」的調查卻發現兩者出現此消彼長的情況：市民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上升，而「中國人」身份認同則下降。這是由於市民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升幅高於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升幅。這種情況下，如受訪者被要求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更

多人會選擇「香港人」，更少人會選擇「中國人」，是以採用「主要身份」的調查得出非常誤導性的結果。

(3) 各年齡、教育及政治傾向組別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比較三輪調查（表二）

表二顯示在三輪調查中，除青年人（18 歲至 29 歲）外的所有年齡組別，以及所有教育組別（小學到研究院）對「中國人」身份皆有較高認同，評分都高於中位數 5 分。年齡較高的組別（50 歲或以上）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顯地高於青壯年（18 歲至 49 歲）。

青年人對「中國人」的認同維持徘徊於中位數 5 分，決策者須努力培養青年的國民身份認同。三輪調查中，青年對「中國人」的認同非常兩極化。在最近一輪調查，對「中國人」身份有較高認同（高於 5 分）的有 38.0%，較低認同（低於 5 分）的有 40.9%，中度認同的有 21.1%。

表二：各年齡、教育及政治傾向組別的「中國人」身份認同

		2017.6	2017.12	2018.6	2017.6	2017.12	2018.6
		受訪人數			平均分 (0-10)		
所有市民		979	986	981	6.63	6.71	6.78
年齡	18 至 29 歲	176	169	169	4.93	5.06	4.96
	30 至 39 歲	165	166	165	5.92	6.26	6.30
	40 至 49 歲	173	174	172	6.73	6.56	6.71
	50 至 59 歲	204	201	201	7.06	7.14	7.35
	60 至 69 歲	142	147	147	7.40	7.57	7.88
	70 歲或以上	120	129	127	8.04	7.70	7.76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125	121	112	7.74	8.03	8.00
	初中	116	121	111	7.26	7.58	7.44
	高中	294	295	301	6.79	6.54	6.95
	專上非學位	116	116	127	6.08	6.49	6.35
	大學學位	270	274	275	5.70	5.87	6.10
	研究院	55	53	49	7.08	6.64	6.17
政治傾向	建制派	98	95	101	8.86	9.43	9.50
	中間派	569	592	603	6.93	7.09	7.18
	非建制派	279	263	248	5.16	4.63	4.50
	其中：民主派	207	198	184	5.74	5.16	5.16
	其中：其他非建制派	72	65	64	3.50	3.01	2.61

在政治傾向方面，建制派對「中國人」的身份有極高認同，其認同感顯著高於中間派。經過三輪調查，建制派的認同感進一步加強，其上升程度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

中間派對「中國人」的身份有較高認同，其認同感在三輪調查中逐步加強。市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上升，主要反映建制派及中間派（佔人口超過 70%）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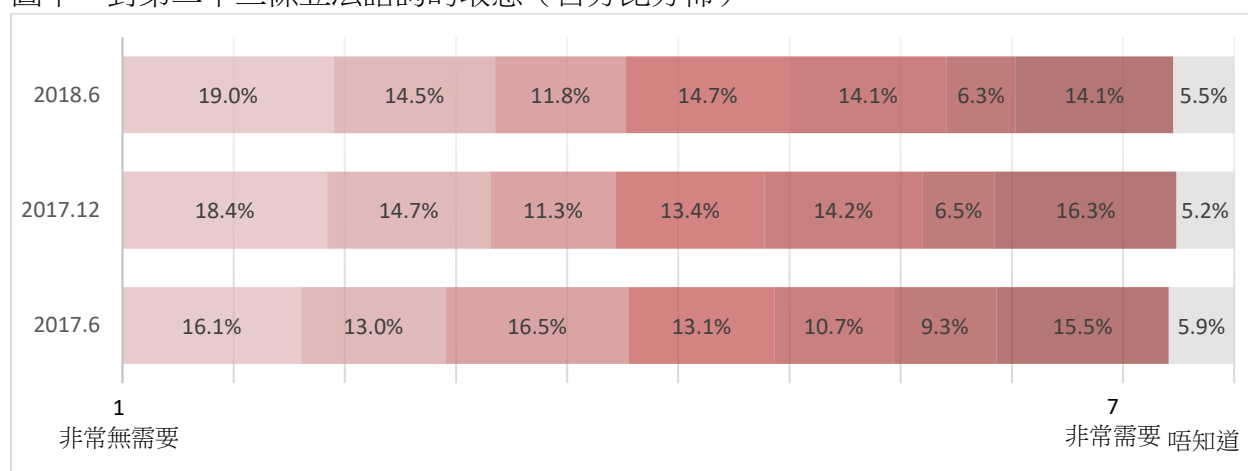
非建制派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較弱（統計上顯著低於中間派的認同感），並在第三輪調查中進一步減弱，下跌幅度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

非建制派當中，民主派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雖然稍高於中位數 5 分，不過其認同感亦有所減弱。「其他非建制派」（主要是本土派者及自決派）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甚弱，其認同感在第三輪調查更持續下降，下降幅度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非建制派（佔第三輪調查受訪者的 25.2%）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與大部分市民愈走愈遠，情況令人擔憂。

(4) 對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的取態 (Q10)

從圖十可見，按 1 至 7 分的尺度，香港市民對今屆政府是否需要就第二十三條立法進行諮詢的取態兩極化。第三輪調查中，給予 1 分（「非常無需要」諮詢）的市民依次為 16.1%、18.4%及 19.0%；給予 7 分（「非常需要」諮詢）的市民依次為 15.5%、16.3%及 14.1%。

圖十：對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的取態（百分比分佈）



取態兩極化的原因相信是部分市民十分反對第二十三條立法，是以反對任何諮詢。贊成諮詢的市民卻認為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不能避免，有諮詢總比無諮詢好。

與中間派比較，建制派較為同意「非常有需要」諮詢，非建制派則較為同意「非常無需要」諮詢。僅計算表明政治傾向的受訪者，在三輪調查中，認為「非常無需要」諮詢的市民依次有 53.9%、58.4%及 50.3%是中間派；認為「非常有需要」諮詢的市民亦依次有 60%、57.5%及 62.4%是中間派。對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的問題，中間派在兩個極端的佔比旗鼓相當，與全港市民一樣未有共識，決策者需要小心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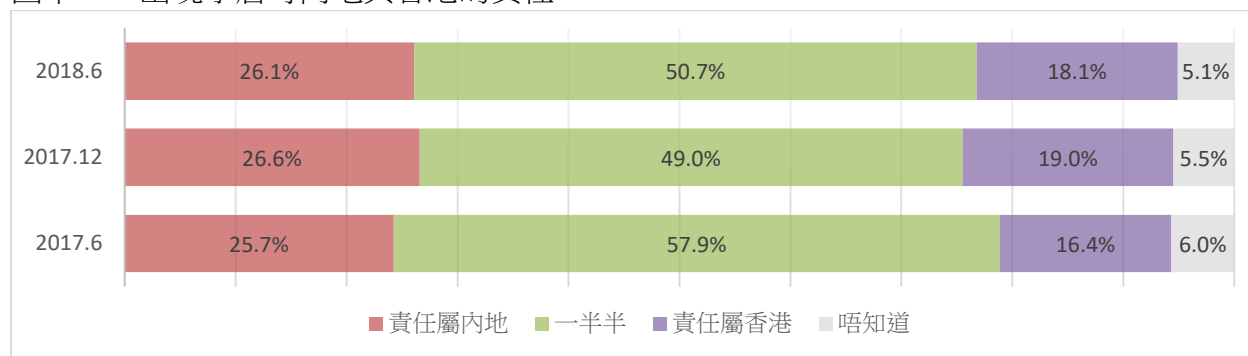
(5) 對《基本法》的認識 (Q11)

雖然市民對《基本法》認識程度的自我評價，由第一輪調查的 4.45 分微升至第二輪調查的 4.53 分，再上升至第三輪調查的 4.63 分，評分仍然低於中位數 5 分，反映市民對《基本法》的認識並不足夠。

(6) 出現矛盾的責任屬內地或香港？ (Q14)

圖十一顯示在三輪調查中，當實踐「一國兩制」出現矛盾時，歸咎責任於內地或香港，大概一半或以上市民選擇「一半半」。四分之一或以上市民認為責任屬於內地，而六分之一或以上市民認為責任屬於香港。

圖十一：出現矛盾時內地與香港的責任



從第一輪到第二輪調查，民意趨向兩極化，認為「一半半」的人從 57.9% 下降至 49%，而認為責任屬於內地或香港的兩者皆升。換言之，更多人指責內地或香港，顯示民意趨向兩極化，令人擔憂。不過，從第二輪至第三輪調查，這股兩極化趨勢有輕微緩和跡象；認為兩者責任「一半半」的由 49% 輕微上升至 50.7%，對內地或香港的指責則輕微減少。但是，從第一輪至第三輪調查整體而言，民意仍然兩極化。

一如預期，建制派傾向指責香港，而非建制派則傾向指責內地。在中間派中，多數人認為雙方擁有同樣責任，不過此比例逐步遞減（從第一輪的 65.9% 下降至第二輪的 60.8%，再進一步下降至第三輪的 60.1%），顯示中間派的態度亦逐漸兩極化。

結果反映中央政府與香港均需就雙方的僵局和矛盾反思自身責任。

(7) 移民與「一國兩制」信心 (Q21、Q22)

表三為不同群體因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而計劃移民的百分比。就整體市民而言，因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而計劃移民的人數（以下簡稱為移民比率）在三輪調查中徘徊在 8% 至 9%。不同政治傾向的移民比率亦大不相同。在第三輪調查中，建制派、中間派、民主派及「其他非建制派」（主要是本土派者及自決派）的移民比率分別為 0%，6.8%，14.9% 和 34.4%。「其他非建制派」在第三次調查的移民比率是中間派的五倍。

表三：因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而計劃移民的人數

	受訪人數			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而計劃移民的比例		
	2017.6	2017.12	2018.6	2017.6	2017.12	2018.6
建制派	101	97	105	1.0%	0%	0%
中間派	580	600	617	7.9%	5.8%	6.8%
非建制派	279	265	248	14.3%	16.8%	19.9%
其中：民主派	207	200	184	14.0%	14.3%	14.9%
其中：其他非建制派	72	65	64	15.3%	24.6%	34.3%
整體市民	996	998	999	8.8%	8.0%	9.2%

從第一輪至第三輪調查，建制派與中間派的移民比率有所下降，但「其他非建制派」則由 15.3% 上升至 34.3%。民主派的移民比率維持在 14% 至 15% 水平。「其他非建制派」的取態與大部分市民背道而馳。因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而計劃移民的人士中，在第三輪調查有 45% 為中間派，52% 為非建制派。

根據過往研究，在民調中聲稱移民的人數，往往遠超真正移民的人數。儘管如此，民調結果仍有一定參考價值，但需小心解讀。中間派聲稱「有信心」而計劃移民，一方面可能是對中央政府及建制派不滿，另一方面亦可能是擔心非建制派，或俗稱「黃絲帶」破壞社會穩定，例如覺得激進政治將會損害香港法治及經濟，兩種可能性皆不能排除。

(8) 第二輪及第三輪調查的熱門議題

第一輪調查後，有不少可能影響市民對「一國兩制」評價的新熱門議題出現。第二輪及第三輪調查加入了以下兩條問題以檢視民意。

1. 林鄭月娥上台對社會撕裂的影響 (Q15)
2. 香港訂立《國歌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 (Q16)

8.1 林鄭月娥上台對社會撕裂的影響 (Q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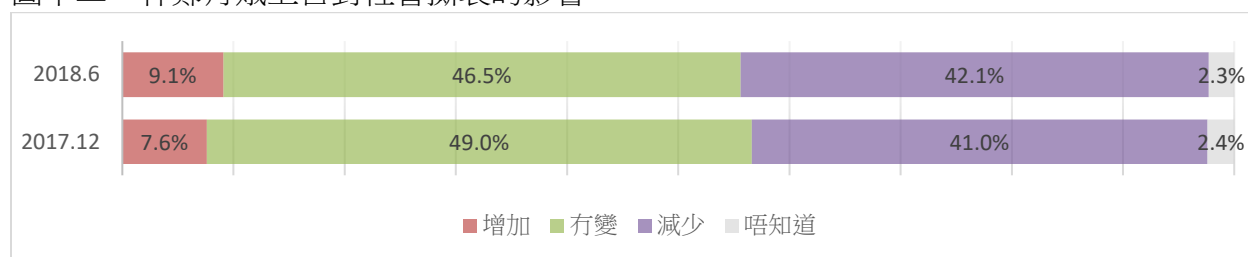
圖十二顯示兩輪調查中，林鄭月娥上台對社會撕裂的影響。多數人認為「冇變」（第二輪：49.0%，第三輪：46.5%）或「減少」（第二輪：41.0%，第三輪：42.1%）。少數人認為「增加」（第二輪：7.6%，第三輪：9.1%）。第二輪與第三輪調查的變化不大：認為「減少」的輕微上升 1.1 個百分點，認為「增加」的輕微上升 1.5 個百分點。兩輪調查中，認為「減少」的遠超認為「增加」的。整體而言，市民認為林鄭月娥上台令社會撕裂減少。

與預期一樣，非建制派比中間派及建制派對林鄭月娥有更多批評。不過即使就非建制派而言，認為「減少」的（第二輪：33.8%，第三輪：30.6%）也比認為「增加」的（第二輪：14.3%，第三輪：15.5%）高出一倍有多。非建制派當中，民主派也對林鄭月娥反應正面：

認為「減少」的（第二輪：35.8%，第三輪：34.6%）比認為「增加」的（第二輪：10%，第三輪：12.1%）高出兩倍。然而，「其他非建制派」（主要是本土派及自決派）對林鄭月娥卻感到負面：認為「減少」的（第二輪：20%，第三輪：19%）比較認為「增加」的（第二輪：43.3%，第三輪：25.4%）少得多。

以上結果顯示，合共超過90%成年人口的建制派、中間派及民主派（即本土派與自決派以外之政治光譜上所有組別），視林鄭月娥為一位能夠修補社會撕裂的行政長官。即使是本土派與自決派，他們對林鄭月娥的負面態度也有所緩和：從第二輪至第三輪調查，認為「增加」的由43.3%大幅下降至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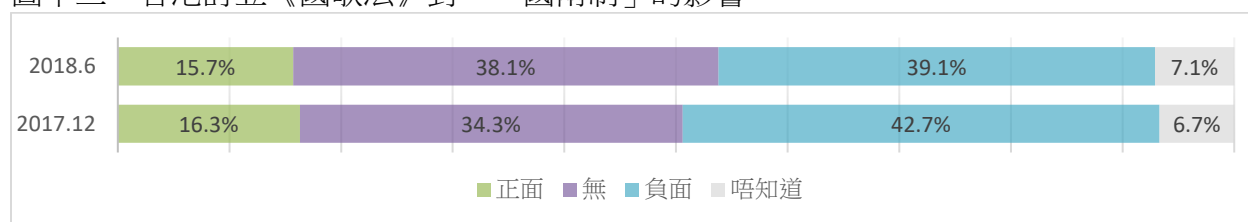
圖十二：林鄭月娥上台對社會撕裂的影響



8.2 香港訂立《國歌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 (Q16)

圖十三顯示兩輪調查中，認為有「負面影響」的（第二輪：42.7%，第三輪：39.1%）遠高於認為有「正面影響」的（第二輪：16.3%，第三輪：15.7%）。市民認為香港訂立《國歌法》對「一國兩制」有負面影響，雖然第三輪調查的負面情緒輕微減弱。

圖十三：香港訂立《國歌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



一如所料，建制派對訂立《國歌法》反應正面，而非建制派的反應則非常負面。在中間派當中（佔人口超過60%），認為有「負面影響」的（第二輪：27.8%，第三輪：34.2%）仍然遠高於認為有「正面影響」的（第二輪：17.2%，第三輪：20.1%）。總括而言，市民對訂立《國歌法》有一定擔憂。

(9) 第三輪調查的新熱門議題

第三輪調查加入以下五條新問題以詢問市民對熱門議題的意見：

1. 是否認識粵港澳大灣區？（Q20）
2. 香港應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Q21）
3. 會否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居住或發展？（Q22）

4. 香港應否參與「一帶一路」發展？(Q23)
5. 中聯辦開放日能否拉近與市民距離？(Q24)

9.1 是否認識粵港澳大灣區？(Q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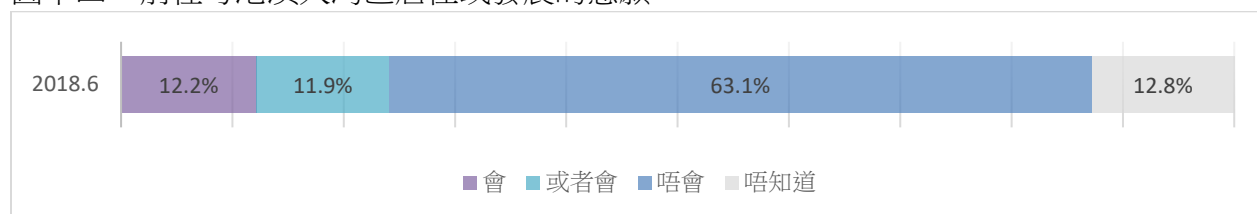
市民對大灣區認識不深，平均分為 3.85 分（0 到 10 分）。建制派比其他派別支持者較為認識大灣區（4.65 分），反映政府在宣傳方面需要更多努力。

9.2 香港應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Q21)

市民同意香港應該參與大灣區發展，平均分為 6.37 分（0 到 10 分）。建制派相當正面（8.08 分），非建制派偏向正面（5.43 分）。非建制派當中，民主派偏向正面（5.86 分），但「其他非建制派」（主要是本土派及自決派）則偏向負面（4.3 分）。

9.3 會否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居住或發展（升學、就業、做生意、退休）？(Q22)

圖十四：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居住或發展的意願



圖十四顯示只有 12.2% 的市民「會」考慮前往大灣區其他城市居住或發展，另有 11.9% 「或者會」考慮，但 63.1% 「不會」考慮。在不同年齡組別中，有兩個年齡組別更傾向考慮前往：30 至 39 歲（16.1% 「會」），60 至 69 歲（18.5% 「會」）。此結果合符預期，因為 30 至 39 歲組別比學生和青年更有經驗，有更好的裝備往大灣區居住或發展；60 至 69 歲組別包括將會退休的「年輕長者」，他們有興趣退休至大灣區也可理解。至於 70 歲或以上組別，只有 13.6% 「會」考慮前往，這個組別包括那些需求醫療服務的「老年長者」，他們不太願意遷居。

9.4 香港應否參與「一帶一路」發展？(Q23)

市民同意香港應參與「一帶一路」發展，平均分為 6.3 分（0 到 10 分）。建制派相當正面（8.06 分）。非建制派當中，民主派偏向正面（5.87 分），但「其他非建制派」（主要是本土派及自決派）則偏向負面（4.27 分）。

9.5 中聯辦開放日能否拉近與市民距離？(Q24)

市民偏向同意中聯辦開放日能拉近與公眾距離，平均分為 5.32 分（0 到 10 分）。建制派及中間派偏向正面（分別為 5.68 分及 5.38 分），非建制派卻偏向負面（4.32 分）。非建

制派當中，民主派偏向負面（4.65 分），而「其他非建制派」（主要是本土派及自決派）則相當負面（3.32 分）。

建制派與中間派合共超過人口 70%，結果顯示中聯辦開放日能拉近與大多數市民距離。

(10) 總結市民對新議題的意見

總括而言，佔成年人口超過 90% 的建制派、中間派及民主派（即除本土派及自決派以外的整個政治光譜）認為林鄭月娥是一位能夠修補社會撕裂的行政長官；他們亦同意香港應該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然而，市民對粵港澳大灣區認識不深，政府在宣傳方面需要更努力。市民中「會」及「或者會」考慮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居住、工作或退休的分別只有 12.2% 和 11.9%，顯示促進大灣區融合需要更有效的措施。

II. 國際自由民主指數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中國最開放及國際化的城市。自由與民主是「一國兩制」的重要部分，而國際社會對香港自由與民主的觀感對落實「一國兩制」尤其重要。所以，我們將公眾調查所得的評分（指數 A）與國際指數所得的評分（指數 B）給予相同比重。

指數 B 為三項指數的平均分，分別為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及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編制的「經濟自由指數」及「個人自由指數」和經濟學人智庫編制的「民主指數」。「經濟自由指數」和「個人自由指數」的平均值被稱為「人類自由指數」，是目前衡量自由的指數中最全面的一種。香港在經濟自由方面一直名列世界第一，在個人自由方面也名列前茅。因此，香港在 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一直在「人類自由指數」排名世界第一。

由於香港未能普選行政長官，所以香港在「民主指數」中的排名不算突出。香港的得分低於日本，台灣和韓國，與新加坡相若。

因為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地區，一般而言，發達地區的自由與民主指數，均高於發展中的地區，是以我們選取香港鄰近的發達國家及地區，包括日本、南韓、新加坡及台灣作比較，藉以評價香港的表現。我們亦比較內地與香港的自由指數與民主指數，以觀察在「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是否趨向「大陸化」。為簡便起見，我們將日本、南韓、新加坡、台灣與中國內地稱為「鄰近地區」。

由於「人類自由指數」覆蓋大量國家，數據整合滯後兩年。最新發表的「2017 人類自由指數」，只反映 2015 年的數據。2018 年初發佈的《「一國兩制」指數》第二份報告中，我們已參照卡托研究所及菲沙研究所的編制方法，將香港與鄰近地區的「人類自由指數」更新至 2016 年。在本報告中，我們將更新香港及鄰近地區的「個人自由指數」及「經濟自由指數」至 2017 年。「人類自由指數」為這兩個指數的平均值。「民主指數」已經反映 2017 年的情況，所以毋須更新。

(1) 更新「個人自由指數」（表四）

「個人自由指數」由七個子項目組成，分別為法治、安全、遷徙、宗教自由、結社自由、言論及資訊自由和性別認同及關係，均是人權和人身自由的重要元素。表四為香港及鄰近地區更新至 2017 年的評分（更新方法見註釋）。香港於 2014 年至 2016 年的評分亦一併表列，2014 年及 2015 年評分取自卡托研究所及菲沙研究所報告，2016 年評分為《「一國兩制」指數》第二份報告的推算，2017 年評分則為本報告的更新。

表四：更新香港與鄰近地區的「個人自由指數」*

	年份	「個人自由指數」							總分
		法治	安全	遷徙	宗教自由	結社自由	言論及資訊	性別認同及關係	
香港	2014	7.80	9.33	10.00	10.00	9.79	8.23	10.00	9.08
	2015	7.79	9.40	10.00	9.26	7.64	8.77	9.25	8.79
	2016	7.14	9.40	10.00	9.26	7.64	8.67	9.25	8.62
	2017	6.55	9.78	10.00	9.26	7.64	8.80	9.25	8.58
中國內地	2017	4.70	7.93	3.33	4.94	1.67	6.03	10.00	5.75
日本	2017	7.64	9.82	10.00	8.75	8.89	9.27	9.25	8.98
韓國	2017	7.44	9.58	8.33	9.26	9.44	10.58	9.25	8.94
新加坡	2017	7.68	9.35	8.33	7.69	3.61	7.51	8.00	7.77
台灣	2017	7.62	9.5	10.00	9.19	9.86	9.73	10.00	9.16

*更新方法：「安全」取自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數」的「安全」數據，「言論及資訊自由」取自無國界記者「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其餘五項取自自由之家「世界自由調查報告」的相關數據。我們計算七個項目在相關報告自 2016 年至 2017 年的百分比變化，套用於《「一國兩制」指數》第二份報告中對各個項目的 2016 年推算的評分，從而得出 2017 年的評分。

香港的「個人自由指數」由 2008 年的 8.87 分攀升至 2014 年 9.08 分的高峰，隨後回落至 2017 年的 8.58 分，相當於自 2014 年的高峰下降了 5.5%。七個子項目中，有四個下降：即法治（下降 16.0%）、宗教自由（下降 7.4%）、結社自由（下降 22%）和性別認同及關係（下降 7.5%）；兩個子項目上升，分別是安全（上升 4.8%）和言論及資訊自由（上升 6.9%）。法治與結社自由的大幅下跌，很可能是由於國際媒體對「佔中」及旺角騷亂案中的負面報導所致。

儘管 2014 年至 2017 年錄得跌幅，香港在個人自由方面的得分仍然良好，接近日本、台灣、南韓及新加坡等發達鄰近地區，證明香港能夠在「一國兩制」下捍衛高水平的人權與個人自由。

(2) 更新「經濟自由指數」

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與卡托研究所及菲沙研究所的同名指數非常相似，而前者只有一年時差，而非後者的兩年。從 2016 年到 2017 年，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上升了 0.45%。我們將這百分比變化套用於卡托研究所及菲沙研究所的 2016 年「經濟自由指數」，更新後的 2017 年得分為 9.13（見表五）。

(3) 更新指數 B—「自由民主指數」（表五）

2017 年的「民主指數」已由經濟學人智庫發表。憑更新後的「經濟自由指數」及「個人自由指數」，我們可以計算更新的「人類自由指數」及指數 B。2017 年，香港的「人類自由指數」得分為 8.85，高於所有鄰近地區。香港的指數 B—「自由民主指數」為 8.01，低於台灣、南韓及日本，卻高於新加坡。

表五：更新香港與鄰近地區的國際指數

	指數 B—「自由民主指數」				
	「人類自由指數」（2017）			民主指數（2017）	總分
	經濟自由	個人自由	總分		
香港	9.13	8.58	8.85	6.31 (71)	8.01
中國內地	7.11	5.75	6.43	3.10 (139)	5.32
日本	7.39	8.98	8.19	7.88 (23)	8.08
韓國	7.76	8.94	8.35	8.00 (20)	8.23
新加坡	8.91	7.77	8.34	6.32 (69)	7.67
台灣	7.90	9.16	8.53	7.73 (33)	8.26

(4) 香港各指數近年的趨勢（表六）

過去十年，香港的民主發展有一定成果。「民主指數」由 2008 年的 5.85 上升至 2015 年 6.5 分的頂點，排名由第 84 位提升至第 67 位，相信與立法會增加直選議席有關。但此評分之後回落至 2017 年的 6.31 分，下降 2.9%。指數 B—「自由民主指數」從 2008 年的 7.96 分上升至 2014 年 8.19 分的高峰，但隨後又下降至 2017 年的 8.01 分，下降 2.2%。

鑑於國際社會對香港近期的政治事件反應負面，這些指標錄得跌幅並不令人意外。香港的「個人自由指數」、「民主指數」及指數 B—「自由民主指數」分別自高峰下降 6.1%，2.2%和 2.2%。儘管「個人自由指數」的跌幅最大，但 2017 年的 8.58 分仍然不俗，與發達鄰近地區相若。

表六：香港近年在國際指數的評分及排名

	指數 B—「自由民主指數」				
	「人類自由指數」(2017)			民主指數(2017)	總分
	經濟自由	個人自由	總分		
2008	9.17 (1)	8.87 (26)	9.02 (1)	5.85 (84)	7.96
2010	8.96 (1)	8.90 (26)	8.93 (1)	5.92 (81)	7.93
2011	8.92 (1)	9.14 (18)	9.03 (1)	5.92 (80)	7.99
2012	8.98 (1)	9.09 (18)	9.04 (1)	6.42 (63)	8.16
2013	8.97 (1)	9.01 (20)	8.99 (1)	6.42 (65)	8.13
2014	9.03 (1)	9.08 (20)	9.06 (1)	6.46 (66)	8.19
2015	8.97 (1)	8.79 (26)	8.88 (2)	6.50 (67)	8.09
2016	9.09	8.62	8.85	6.42 (68)	8.04
2017	9.13	8.58	8.85	6.31 (71)	8.01

縱觀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間，「個人自由指數」七個子項目的變化，有四項得分下降，分別是法治水平、宗教自由、結社自由及性別認同及關係，顯示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個人自由有所顧慮。

儘管近年的下跌，香港的「個人自由指數」、「民主指數」和指數 B—「自由民主指數」的得分和排名仍然高於內地不少，印證香港被「大陸化」的說法缺乏根據。

IV. 「一國兩制」輿情指數

媒體所傳遞的情緒是形成民意的重要因素，故此，我們嘗試利用大數據技術去衡量媒體情緒，藉此透視大眾傳媒對「一國兩制」的感受及意見，編製輿論情緒對「一國兩制」的晴雨表。「一國兩制」輿情指數為一段時間內所有報紙文章的情緒淨值指數，以半年結為基礎，配合我們的主指數及補充其不足之處。

長遠而言，如資源許可，輿情指數能為民意形成開拓更多研究機會。輿情指數不受以傳統調查方式收集民意時所產生的滯後影響，因此能以高頻率編製（例如每月）。它亦可以調查特定重大事件（例如高鐵一地兩檢安排）對媒體情緒的影響，或比較本地及海外媒體的情緒。

「一國兩制」輿情指數從 20 家本地報章搜集 128,000 多篇報導，逾 6,400 萬字。報紙只是媒體的一部分，輿情指數不包括電視、電台等傳統電子媒體報導的新聞，也不包括新媒體所報導的新聞。由於電視和電台沒有全面的文本數據庫，所以要衡量它們的新聞情緒非常困難。衡量新媒體的情緒則對資源有較高要求，所以也非常困難。此外，雖然民意調查定期評估不同報紙的公信力，得到廣泛認可，然而對新媒體的公信力卻沒有可比的評價。故此，我們的研究將會聚焦於與「一國兩制」有關的報紙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報紙也透過網站、手機程式等網上媒介傳播。這些網上媒介的報導與印刷版本大多相同，所以無論是印刷或網上版本，其情緒已經涵括在輿情指數之中。目前，輿情指數只衡量大眾傳媒的一個重要部分——印刷報紙，以評估大眾傳媒整體的輿情。

(1) 「一國兩制」輿情指數（半年結）

2018 年上半年的「一國兩制」輿情指數為 99.22，比半年前的 97.14 上升，與主指數同樣錄得升幅（表七）。2018 年上半年發生以下影響「一國兩制」輿情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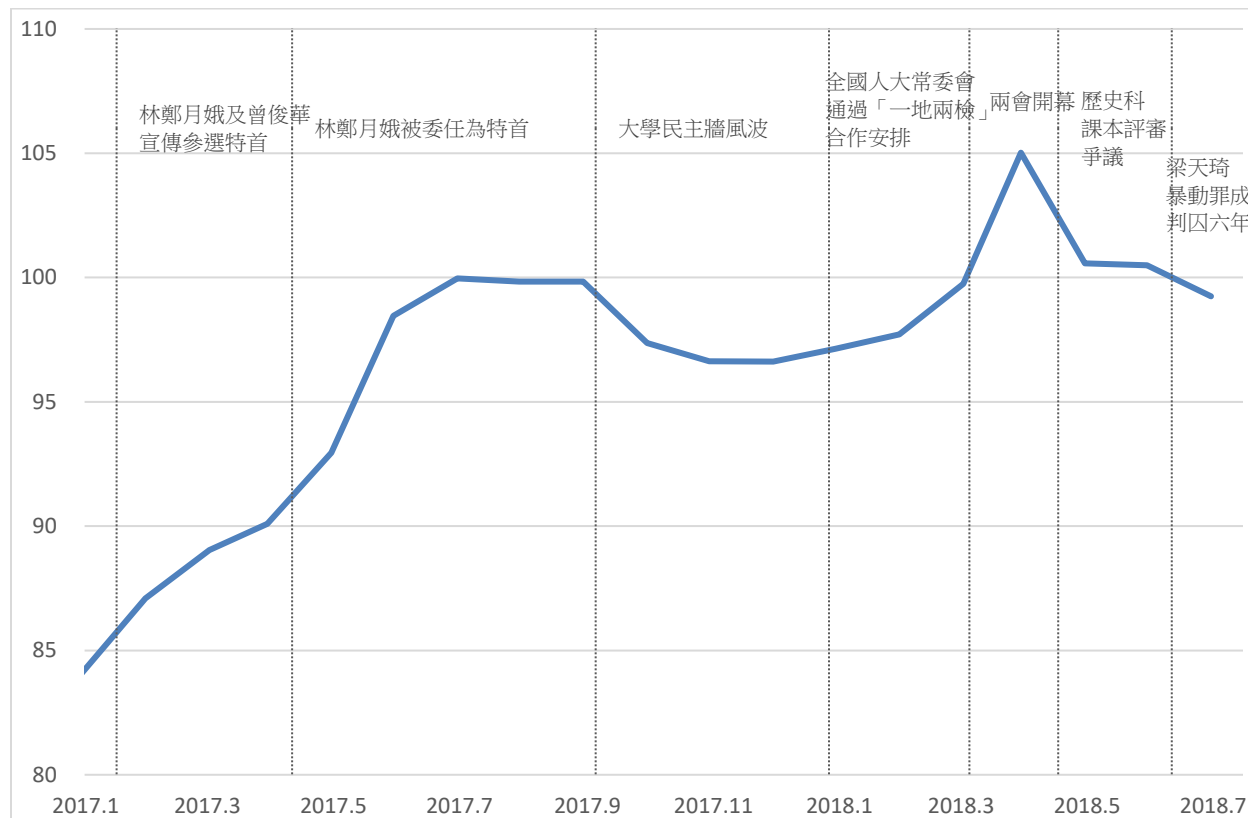
-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一地兩檢」合作安排，大律師公會批評方案衝擊「一國兩制」；
- 有意代表香港眾志出選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周庭，被裁定參選提名無效；
- 兩會閉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分別重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
- 教育局審批高中歷史科教科書，對部分內文及字句的評語引起風波；
- 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為香港首次舉辦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
- 歐盟發表《2017 年香港特區年度報告》，擔憂「高度自治」被逐步蠶食；

- 國家科技部、財政部批准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 立法會審議及通過「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 本土民主前線領袖梁天琦參與旺角騷亂暴動罪成，判囚六年。

表七：「一國兩制」輿情指數（半年結）

2017 H1	2017 H2	2018 H1
99.96	97.14	99.22

圖十五：「一國兩制」輿情指數（月結）



(2) 輿情趨勢

2.1 比較現有民調

在香港進行的研究顯示，媒體報導具有塑造民意的預示效果（priming effect）¹，而輿情分析的結果將會領先電話調查大約兩個星期²。圖十六比較「一國兩制」輿情指數與兩個團體，分別為香港電台³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⁴，關於「一國兩制」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儘管三項結果在數字上存在差異，但均呈現相似的整體趨勢。三組數字均由 2000 年初上升至大概 2007 年的頂點，隨著「佔領中環」與旺角騷亂下降至 2014-16 年的低谷，隨後回升。

就三項結果的差異而言，「一國兩制」輿情指數較能反映高級官員講話和活動的即時影響，尤其是受媒體廣泛報道的中國領導人。民調所顯示的整體觀感則有可能受到與「一國兩制」無直接關係的事件影響，例如民望高企的曾蔭權在 2007 年再次當選行政長官，令市民對未來感到樂觀。「一國兩制」輿情指數亦較能呈現新聞性高的事件，而民調則體現較有普遍影響的事件。例如，突發性高卻牽連較少群眾的旺角騷亂時，「一國兩制」輿情指數給予較負面的評價，而在各方面也影響廣大公眾的「佔領中環」運動中，民調給予較負面的評價。

2.2 歷年變化

圖十六顯示自 1998 年起，「一國兩制」輿情指數整體向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討論與諮詢於 2002 年展開，輿情指數從高位轉折，直至政府於 2003 年 9 月撤回立法草案後短暫反彈。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4 年 4 月就政制發展釋法，令輿情指數有一定跌幅，及在董建華於 2005 年 3 月辭去行政長官後止跌回升。2006 年 3 月，國家「十一五」規劃首次納入港澳專章，推動輿情指數達到回歸後第二高位。2009 年 10 月，一系列國慶 60 周年慶祝活動更令輿情指數攀上頂點。

為爭取「雙普選」而發起的「五區總辭」，開啟了自 2010 年起為期數年的低潮。雖然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後一度回暖，但是 2011 年 1 月的悼念司徒華活動中，民運人士被拒絕入境，隨後「雙非嬰」問題、「光復上水」運動和「奶粉荒」將輿情指數推到該段時期的最

¹ Willnat, L., & Zhu, J. H. (1996). Newspaper coverage and public opinion in Hong Kong: 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media prim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3(2), 231-246.

² Fu, K. W., & Chan, C. H. (2013). Analyzing online sentiment to predict telephone poll result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9), 702-707.

³ 香港電台每年委託香港亞太研究所就香港現況及前景進行調查，相應問題為「對回歸以來香港整體發展的滿意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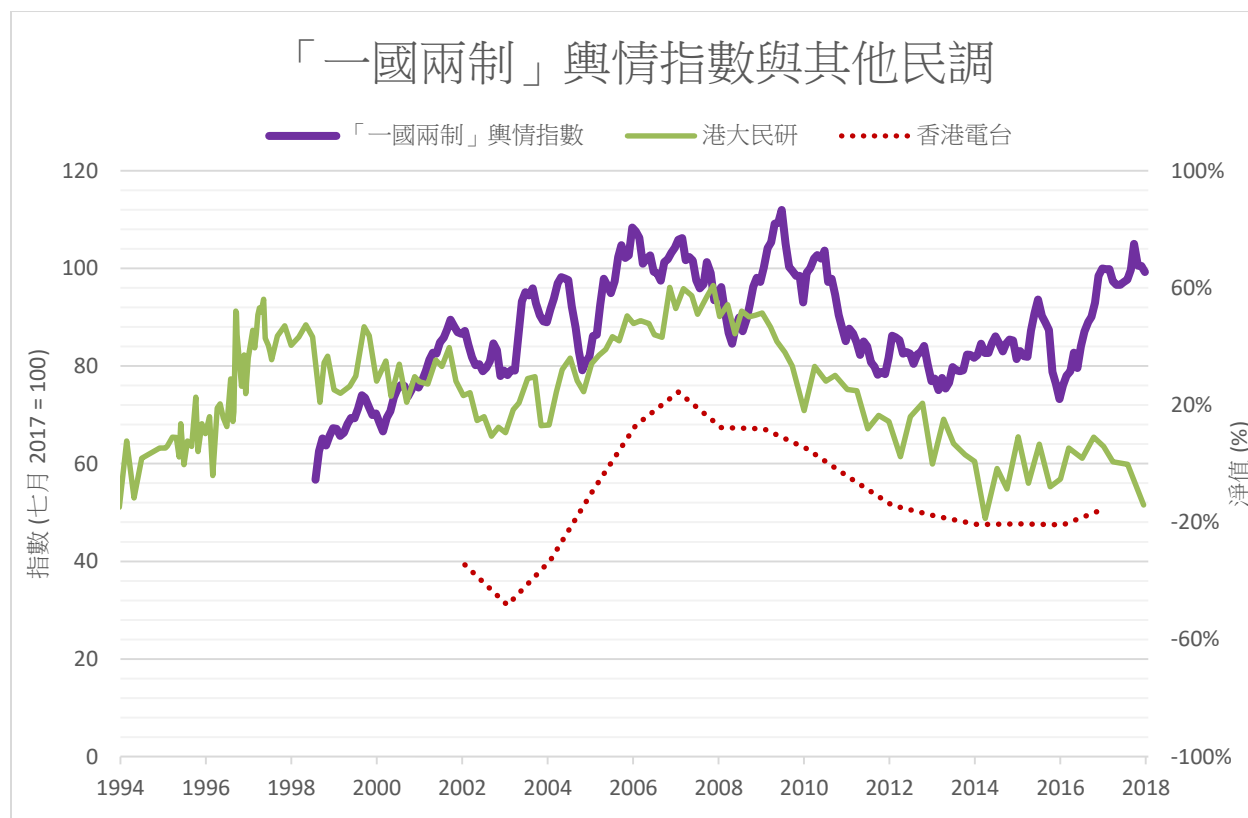
⁴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近年每三個月就市民對「一國兩制」信心進行調查，相應問題為「咁整體黎講，你對一國兩制有冇信心？」

低點。2014 至 2015 年間發生劉進圖遇襲案及「光復元朗」、「光復屯門」運動，而《「一國兩制」白皮書》、人大「8.31」決定和「佔領中環」的輿情相持不下，令這一年多的輿情指數在波幅中維持相對平穩水平。輿情指數要在習近平與英女王於 2015 年 10 月會面，肯定「一國兩制」的歷史成就後才見突破。

「一國兩制」在 2016 年年初面臨最大的挑戰，輿情指數接連急跌。「銅鑼灣書店」事件在 1 月引起傳媒廣泛關注，旺角騷亂在 2 月演變成警民流血衝突，再加上獨立電影《十年》在 4 月獲獎，讓「一國兩制」矇上陰霾，達到比 2003 年更負面的低谷。

輿情指數自此從谷底反彈，由 2016 年 12 月梁振英宣布放棄連任後至 2017 年 7 月林鄭月娥上任，輿情指數更有明顯升幅。期間，2016 年 11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2017 年 9 月數所大學的民主牆出現「港獨」標語，及 2018 年初旺角騷亂案的審訊與判刑，均令輿情指數錄得跌幅。不過在林鄭月娥的新政府下，2018 年首半年仍然是自 2009 年以來的高水平。

圖十六：比較「一國兩制」輿情指數與其他民調



表八：「一國兩制」輿情指數數表（2014 年至今）

年份	半年	月份	「一國兩制」輿情指數 (2017 年 7 月=100)	
			月結	半年平均數
2014	H2	七月	83.46	82.28
		八月	88.12	
		九月	84.98	
		十月	81.82	
		十一月	85.67	
		十二月	92.29	
		2015	H1	
二月	77.80			
三月	94.43			
四月	87.11			
五月	84.35			
六月	69.72			
H2	七月		85.16	83.10
	八月		71.31	
	九月		93.72	
	十月		119.39	
	十一月		105.59	
	十二月		86.43	
2016	H1	一月	65.41	90.31
		二月	62.97	
		三月	84.60	
		四月	67.90	
		五月	90.49	
		六月	67.87	
	H2	七月	82.53	76.06
		八月	74.79	
		九月	90.05	
		十月	90.74	
		十一月	71.54	
		十二月	94.74	
2017	H1	一月	100.73	87.10
		二月	86.41	
		三月	96.44	
		四月	107.89	
		五月	104.60	
		六月	103.72	
	H2	七月	100	99.84
		八月	86.38	
		九月	81.64	
		十月	103.44	
		十一月	104.57	
		十二月	106.79	
2018	H1	一月	103.41	97.71
		二月	98.56	
		三月	113.21	
		四月	76.76	
		五月	104.08	
		六月	99.28	

(3) 編制方法

「一國兩制」輿情指數的資料由新聞文章組成，包含 1998 年 4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間，來自本地 20 份日報關於「一國兩制」，約 127,000 份報導及評論。

我們就每篇文章進行「分詞」(tokenization)，通過電腦運算將文章分解成語例(token，為單詞或短語)。我們利用約 20 年的資料組成語料庫，包含大約 6,300 萬個語例。在進一步分析這個龐大的語料庫之前，我們首先剔除無助理解文章的常見單詞(如「我」、「你」、「的」)。為了辨別一篇文章的情緒，我們採用由古倫維、何修維及陳信希(2009)開發的繁體中文情緒字典，把語例分類為「正面」、「中立」(非情感詞)或「負面」。「正面」的語例得 1 分，「中立」得 0 分，「負面」得-1 分⁵。

我們計算每段落所包含的正、負面語例數量，每篇文章的情緒評分則為各個段落經字數調整後的淨值。「一國兩制」輿情指數即為當月所有文章的平均情緒評分，基數月訂為 2017 年 7 月，基數為 100，以標誌回歸 20 周年的情況。從表三可以看到，不同報章所刊登的文章數目有明顯差別。因此，只考慮文章數目不足以呈現不同報章對讀者觀感的影響力。為確保可靠性，本指數將採用由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市民對傳媒公信力的評分」為每份報章的情緒評分加權。

⁵ Ku, Lun-Wei, Ho, Xiu-Wei and Chen, Hsin-His (2009). Opinion Mining and Relationship Discovery Using CopeOpi Opinion Analysis System,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0(7), pp1486-1503.

表九：報章來源

報章	文章篇數
A 報	81
am730	1,847
蘋果日報	8,131
頭條日報	892
香港商報	12,312
新報	4,476
信報	8,929
經濟日報	3,788
公正報	194
都市日報	1,253
明報	10,492
東方日報	7,240
爽報	152
成報	4,670
星島日報	6,712
晴報	407
大公報	25,701
太陽報	4,828
天天日報	452
文匯報	25,396
總數	127,953

表十：按年份劃分的資料字數

年份	字數
1998	669,676
1999	2,498,254
2000	2,320,584
2001	2,640,690
2002	2,545,546
2003	2,713,403
2004	4,801,621
2005	2,874,994
2006	1,879,834
2007	2,797,512
2008	1,446,629
2009	1,815,839
2010	1,880,198
2011	2,040,824
2012	3,441,893
2013	3,312,415
2014	5,386,835
2015	4,411,567
2016	5,590,354
2017	6,204,647
2018 (H1)	2,456,416
總數	63,729,731

(4) 準確度覆查

「一國兩制」輿情指數是建基於由詞彙組成的模型。此模型視每段落為一籃子的詞語，從而抽離整篇文章的脈絡。其中一個效果是可能無法辨認到如諷刺等寫作手法，因而不能完全理解每一個段落的真正含義。這個局限在分析小說及文學作品時可能較為明顯，但對於寫作手法較直接的新聞文章而言，相信不是一個問題。

為證實此詞彙模型辨別情緒的準確度，我們兩位研究員從語料庫中隨機抽取了約 18,000 個段落，親自分類為「正面」、「負面」和「中立」，再與詞彙模型比較。各段落的出處在給予研究員之前已經被隱藏。假如兩名研究員對同一個段落的情緒判斷有異，第三名研究員將會重讀並作出判斷。

是次覆查中，兩名研究員在大約八成的情況下均能作出相同的判斷。如表五所顯示，2,363 及 1,472 個段落分別被判決為「正面」及「負面」。

利用與「一國兩制」輿情指數相同的詞彙模型，此等段落的情緒將會被評分。在我們的計算中，情緒評分為正、負面詞語量的淨值，所以評分愈高代表情緒愈正面。

表十一顯示利用詞彙模型計算的情緒評分。被研究員判斷為「正面」的段落，情緒評分為 21.76%，約為「負面」段落的 7.5 倍。再者，利用多變量回歸分析，三個類別的情緒評分發現具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證實詞彙模型的計算結果與我們研究員的人手分類一致。

表十一：覆查結果

	正面	中立	負面
真人研究員對情緒的判斷	2,363	14,202	1,472
情緒淨值（基於詞彙模型計算）	21.76%	14.42%	2.92%

附錄 I：指數 A 的編制方式

指數 A 為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綜合評價，由九個項目構成。概念上，有不同方式將九個項目計算為綜合評分，我們採用每個項目權重相同的簡單平均數。因為理論上不同項目可能帶有不同比重，簡單平均數未必是最好的編制方式，是以我們考慮兩種更複雜的方式與簡單平均數比較，分別為「主成分分析」與「因子分析」。表一是以三種方式計算指數 A 的評分，結果非常相似，所以我們採用最常見及最容易理解的簡單平均數。

表一：不同方式編制的民調評分（有效樣本：901 人）

	評分 (1-7)	評分 (0-10)
簡單平均數	4.03	5.05
主成分分析	4.04	5.06
因子分析	4	5

三種方式編制的結果十分接近，相信是由於市民對九個項目的評價相當近似（九個項目的分佈高度相關），是其主要成分或主要因子與各個項目都十分接近。

簡單平均數（九個項目）

這是編制指數最常用的方法，優點是簡單及容易明白，缺點是假定所有項目都同等重要（即所有項目的權重相等）。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主成分分析是一種分析和簡化數據的統計技術，是以科學化方式編制指數的標準方法，其方法是通過對數據進行特徵分解，以得出數據的主要成分與它們的權值，優點是揭露數據的內部結構，從而更好解釋數據的變化，缺點是計算繁複，一般人難以掌握。經過繁複計算後，我們發現數據的主要成分與九個項目的每一個項目都十分接近，是以計算的結果與採用簡單平均數沒有大分別。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

因子分析是從數據中提取公性因子的統計方法，技術與主成分分析類似，其優點是可以在多項變量中找出隱藏及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將相同本質的變量歸入一個因子，從而減少變量的數目，缺點是計算十分繁複，外行人亦難以明白。經過繁複計算後，我們發現數據的主要因子與九個項目的每一個項目都十分接近，是以計算的結果與採用簡單平均數沒有大分別。

因為三種方式編制指數結果十分接近，我們選取最簡單常用的方法，即九個項目的簡單平均數編制「一國兩制」指數。